



记忆 117 期
2014 年 7 月 31 日

目 录

【专 稿】

黄东汉 “起锚”恨史——为逃港死难者立碑记

【林彪研究】

舒 云 《“571 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

蒋 健 林彪集团北京黑据点是何时被查封的？

【北京文革】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四）

19. 市革委会对聂元梓的批判

20. 杨余傅事件

21. 7·27 工、军宣队进入高校，两大派的历史结束

【述 往】

罗 治 风风雨雨话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反动学生”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一）——少年时代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二）——老高三里没“顽主”

【资 料】

张世栋 对师大女附中运动估计和下一步运动的意见（1966 年 6 月 13 日）

张世栋 在师大女附中的讲话（1966 年 6 月 17 日）

【编读往来】

1. 童良谈老田的学风和文风

2. 《记忆》答童良来信

3. 后皇嘉树勘《记忆》第二期程明远生平之误

【版权声明】

【专稿】

“起锚”恨史

——为逃港死难者立碑记

黄东汉

当年中国南方人民，在那阶级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候，为了挣脱暴秦式的统治，展开一场波及到各个阶层，时间颇长的偷渡香港的行动。那也是一场真正自发的人民战争，然而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较量，人民一方自然死伤枕藉。当年逃亡很多人都要二进宫，三进宫，经历多次进出拘留所，才能获得成功。

然而更不幸的是，有不少人在偷渡之中，或摔死在悬崖峭壁之侧，或葬身于汪洋大海之中，有的则惨死在边防的枪口之下。几十年后，究竟当年有几人曾被关进收容所，又究竟有几人成功偷渡，这些数字永远无人知晓。

笔者所知晓，1978年夏从汕尾出发的一条小木船在大亚湾沉没，45个年轻人无一生还。今天在我们这群幸运的老者之中，很多人都有亲友在那场逃亡潮中离开人世，我就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一个街坊一同葬身大鹏湾。

长久以来，我们这些幸运者都有一个愿望：为那些不幸殉难的亲友立一个纪念碑，时时拜祭，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做，一来是社会政治大气候不允许，二来我们还要为生活劳碌。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趁余力尚在，了此心愿。记着历史，记住教训，是我们的责任。为逃港死难者立一个碑，就是用这行动来记住这段历史，警醒后世。

大约三年前（2011年），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大逃港》一书的作者，原湖南下乡知青陈秉安趁来港开会之机，建议为逃港死难者立一纪念碑。这一建议得到了热烈响应。筹划最积极的要数阿津“起锚8主角”，胡君“起锚12主角”，卢君“起锚13主角”及我“起锚9主角”等。阿津1969年秋第一次起锚就成功游过后海湾，但与他一同出发的5个被打成“狗崽子”的同伴都到不了海边。胡君3人1973年12月在梧桐山冲过国防公路时，亲眼目睹两个同伴在斜坡上摔死，只有他身负重伤爬到英界。卢君第一次被捕时，被当猪一样冲洗，尊严尽失。这几个人与我志同道合。

大家都认为，与后海湾相比，葬身于大鹏湾的人最多。后海湾处于珠江口，那里遍布蚝田，海面比大鹏湾稍窄，水比较浅，有的地方大退潮时甚至可以走过来，风浪比大鹏湾小些，也没有鲨鱼，所以游后海湾危险要比大鹏湾小些。但守卫森严，距离海边百里以外的重要路段均设有岗哨。当年的哨兵(多数是荷枪实弹的民兵)只要找到过客藏有指南针，东莞或宝安县(深圳属宝安)的地图、救生圈等，就以偷渡入罪。大鹏湾自然条件恶劣，但守卫较后海湾稍为松懈。它位处香港东北，紧邻太平洋，海面辽阔，风高浪大流急，平常的日子也会无风三尺浪，且时有鲨鱼出没，大鹏湾就有一处地名叫鲨鱼沟。当年走东线游大鹏湾的人，一定要计算好潮水涨退及下水的位置，如选择错误很容易给海流冲到太平洋去。

当年逃亡者突破围追堵截，抵达海边时，距当初的预算已相差很多，此时下水真要赌一赌自己的运气。他们选择宁与天斗，宁葬身大海，亦不愿失手被擒，回去被批斗，受侮辱。当年的大鹏湾可不是今天这模样。今天的大鹏湾由于填海建了个盐田港，海面显得窄小了。当年死于大鹏湾的风浪及鲨鱼口的人，要比后海湾多很多。那些能从大鹏湾安然游过来的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而且运气特别好；如果运气稍差，即使泳术高强，也会遇到鲨鱼或给海流冲到太平洋去。

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后，一致认为纪念碑最好建在大鹏湾畔的沙头角岸边。有了初步意向后，我们立即行动。想不到此事真的困难重重，香港左的势力原来如此强大，我们一出手就被杀了个下马威。当时我先打了个电话给新界北区的一名区议员，希望能从中获得帮助，不料对方一听明我的来意后，什么话也不说就收了线，以后再也不听我的电话。我没气馁，继续联络其他的新界北区区议员。我对他们说，此事很有意义，除了纪念死者之外，立碑处还可成为香港的一个旅游景点，对繁荣地方经济会有好处。我的话其实很有道理，但他们大都没有耐性听完，就匆匆挂线。有个别议员还说，“这事不关他们的事”。立碑的事会困难重重，本也是在意料之中，想不到的是一开始就受到如此阻滞。

纪念碑既然要立在大鹏湾的沙头角岸边，那总得先要去那儿看看，考察一下实际环境吧。沙头角是边境禁区，外人出入都要去差馆申请禁区纸，要由居住在里面的人作担保。我那时还未退休，刚好有一个女同事居住在禁区里，她也愿意为我们申请禁区纸。我把我们一行几人的身分证副本交给她，几日后她把我们的身分证副本原封不动退还给我，理由是她丈夫知道我们的目的后，对她说我们搞

这些，“中联办”肯定不高兴，肯定不同意，为免麻烦因而拒绝为我们作担保。香港自回归后至今，像“中联办”等左派势力越来越大，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怎能容许我们在此立这样的碑？

大鹏湾既然进不去，我们便开始考虑后海湾。当年的后海湾也是偷渡者越境的热门地点，死的人也不少，但与紧邻太平洋的大鹏湾相比，自然少很多。现在香港这边的后海湾，由于没有什么禁区，很多地方都建起了高楼大厦，一些地方如红树林区、流浮山等则发展为旅游区。在这些地方立碑，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除非香港政府批准，否则就是自投罗网，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所立之碑也会立即被毁。我们不得不慎重其事，以致迟迟不敢行动。

一开始就遭遇挫折，立碑之事唯有拖延。不久香港特首选战开始，我们曾把希望寄托在梁营的刘梦熊身上，希望凭藉他既是偷渡者又有什么人大、政协的身分，能帮助完成此事。但不久我们放弃了此想法，一来我们到不了他身边，二来从其他渠道对他了解多些，也就不屑找他帮忙，三来不久他也出事了，自身难保。

2012年中，我退休了，可花多些时间为死难者做点事了。一次在茶聚中，胡君说，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地点，他有一个朋友在香港南边的离岛喜灵洲有一个教堂，属私人地方，不受政府管辖，必要时可在那里立碑。但大家考虑后，认为喜灵洲不是当年逃亡者的登陆点，意义不大，但可作为最后的考虑点。

既然我们大家都属意大鹏湾，陆路上沙头角我们去不了，那么我们决定从海上进入大鹏湾。2012年至2013年中，我们开始将目光盯着大鹏湾香港这边的一系列小岛，尤其是那几个假日游人可以去的岛。事实上当年直接游到沙头角上岸的人很少，大部分逃亡者由于风向、海流及下水地点的关系，最后上岸地点都是大鹏湾的小岛。阿津从事航运业，对于香港海域情况及游艇租赁业务非常熟悉。为了弄清大鹏湾各个岛屿的现况，看看哪儿可以让我等秘密建碑，他便先后于2012年底及2013年6月2日、8月18日，组织了三次大鹏湾游艇活动。别人是为了旅游，我们却另有目的，每到一处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暗中考察，看看哪儿可让我们偷偷建碑。我们只有乘坐游艇才能进入大鹏湾。三次活动中，我们先后考察了吉澳、东平洲及鸭洲等几个岛屿。

经考察后，吉澳与东平洲比较大，北面正对大陆的盐田港，当年很多人在这里上岸，在这里建碑最好。但岛上有人居住，要立碑必先征求得当地人同意才行。鉴于对香港左派势力的畏惧，恐怕开口求人自讨没趣，故暂不考虑。鸭洲是个（吉澳岛一角）无人居住的小岛，经考察后阿津与卢君力主在鸭洲立碑，且碑位



选择在鸭头较高处，面向北方。但鸭洲尤其是鸭头是个旅游点，假日会有很多游客上岸，在此立碑很快就会被发现，碑自然很快就会被左派势力砸毁，而我辈立碑人亦将会被香港政府检控。2013 年 8 月，经第三次考察后，在阿津及卢君的坚持下，我

们统一了思想，就是冒着被香港政府检控的危险，也要把碑立在鸭头上，时间定在 2014 年 5 月 1 日。

我们为当年逃港死难者立碑的事，是受到海内外很多朋友支持的，尤其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我的几个旅居美国的知青朋友，知道消息后都想回来参加。湖南知青陈秉安、李建中、程保罗等来电要代表湖南知青捐款，上海知青宋刚刚介绍建筑设计师，我都一一婉拒了。我对他们说，我们香港知青并不缺钱，目前只是偷偷摸摸地小搞，随时会被检控，等将来可以大搞了，才要他们帮忙。

既有了艰难的决定，我们就要为这决定做准备。首先我们舍弃了诸如“逃港或偷渡死难者永垂不朽”的太过刺激的碑文设计，几经反复讨论，终于接纳了卢君撰写的“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众越港者立”的碑文。这段碑文虽然有点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当年偷渡，道出了当年偷渡的艰辛与凶险，又不太刺激“北大人”。卢君还机智地提出不刻上立碑日子，这样就算被当局发现也不知何时所立，对我们多了一重保护。至于碑的大小，由于是第一次，加上是要偷偷摸摸，为了运输方便不宜太大，几经研究终于决定碑高 80CM，宽 60CM，厚 1—1 1/4 寸。碑的内容及大小决定之后，胡君“起锚 12 主角”即捐资二千元，

全部承包起做碑的费用。他这样做，一来悼念和他一起滚下斜坡的两位难友，二来也逼使我们不可半途而废，要勇往直前了。

（逃港死难者纪念碑）正当我们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为5月1日硬闯鸭洲



立碑做准备时，2014年初，阿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认识一个从事游艇旅游业务的陈生，通过陈认识了大鹏湾吉澳岛的原居民马哥，马哥同意我们在吉澳岛一义冢立碑，不过大家还需多接触，增加了解及互信。

3月底的一个周末下午，阿津、卢君、阿蔡（曾经的假证伪造专家，曾协助多人逃港，本人

亦是偷渡者）与我及马哥、陈生等在某酒家见面。初见马哥，就感觉到他是一个正义感强，乐于助人的真汉子。他1949年出生于吉澳岛，与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由于他青少年时期都在吉澳岛上生活及读书，他对我们说，当年见到不少的偷渡客在他们那儿上岸，亦见到很多漂浮海面的死尸。他当年曾救助过很多偷渡客，所以很乐意帮我们。大家谈了一会，我就觉得阿津这次找对了人，这个原居民一定帮得了我们。为了增加互信，我索取了马哥及陈生的电邮地址，准备在电脑上把我的《起锚》系列文章传给他俩。席间马哥索取了碑文的内容及尺寸大小等资料，说他也要回去与村中父老民主商讨一下，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为了能令我们几个5月1日前先去看看该义冢的环境，他立即为我们申办禁区纸。大家约定4月6日，即清明节后一天，去看看该义冢。

4月6日早上十时正，我们在水火车站外会合了陈生及马哥。马哥带我们走最经济便宜的路线，也就是他们平时出入吉澳岛的路线。马哥对我说，他已在电脑上看过我的《起锚》系列，觉得很真实，很感人，他会一直帮我们，直到成功为止。他并对我们说，他已将我们要在义冢为逃港死难者立碑一事在村委讨论过，由于是历史事实，没有人反对，但为了一村日后的安宁，要我们不要太过张扬，低调进行，同时一定要按他们的乡规习惯进行，我们自然一万个答应。到了

沙头角禁区，警员见我们几个生面孔的都有禁区纸，准予放行。我们一行很轻松的就进入了大名鼎鼎的禁区沙头角镇。

初到沙头角自然好奇，马哥也识趣的先带我们在镇上转了转。由于是禁区，街上人不多，商铺冷冷清清，也少高楼大厦。我们的禁区纸不能进中英街，只得在街口张望了一会，拍了几张照片后，一行人迳直奔码头而去。到了码头，由于临近清明节的关系，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幸好不久就开船直奔吉澳岛去了。在船上马哥对我们说，沙头角到吉澳每日有4班船来往，这条船是三十年前他为了吉澳岛乡亲，亲自回大陆督造，花了40万人民币。现今本村居民免费，外人则一律收15元。他还介绍吉澳岛为何会有个义冢。根据记载及父老传说，一百多年前吉澳岛有很多人居住，上世纪五十年代岛上最多时有五千多人。岛上商铺林立，还有赌场及烟馆，有很多外来人来此打工及经商。百多年前医药落后，时有瘟疫流行，那些外来人死后由于交通不方便，又不能与本地人葬在一起，故在1912年本地人便在离村很远的一个叫“鬼吊角”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义冢，以收葬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他还说，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见有人去拜祭，后来渐渐随着岛上人口减少，就没人去了。

渡轮航行了约1小时左右，中午时分抵达吉澳码头。本该是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肚饿了，又下着毛毛细雨，但为了赶船期，我们还是饿着肚子先去找义冢。吉澳村离码头很近，通过该村的时候，马哥对我们说，现在整条村只剩下50~60个老人在此常住，连他自己也搬到大埔居住，有事才回吉澳。的确，我们见到该村冷冷清清，只有近码头处有几家专做假期游客生意的小饭馆。经过该村小学时，他说，因为没有学生，该校也在2005年关闭了。经过该村天后宫时，我们进去看了一会，我问马哥为何捐款名录上会有那么多姓氏？他说原来该村立村不太久，所有原住民都不过来了几代，他祖上来自番禺沙湾。现时吉澳村有五十多个姓，是个大杂姓村。穿过村子，我们上了一个小山头，那山头风景优美，环境干净，散落着很多墓穴。马哥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原住民的私家墓地，义冢还有很远。的确，只有原住民的墓地才会葬得那么近村，以方便拜祭；专葬外来人的义冢当然离村越远越好，有鬼也难骚扰该村。

穿过墓地后，由于天雨路滑，加上野草杂树挡路，路越来越难行。再走了半个小时，通过了一个泥泞的草地后，马哥把我们带到了一处海滩。在沙滩上，他

指着远处的一个海滩说，那就是“鬼吊角”。的确，距离那么远，路那么难走，真是鬼才会去上吊的地方。他还说，到那儿去有三种方法。一是走山路，但日子久了已没有路，要披荆斩棘，你们年纪大了很难走了。二是趁退潮时沿着海边走过去，这样要准确计算好潮汐。三是最简单方便快捷的一种，就是坐船到“鬼吊角”，再转小船上岸就是了。当下我们几人面对此环境，很快就做出决定，“鬼吊角”虽然要由吉澳岛的最东端转向南，不是向北面对大陆，位置上有点不太理想，但总算是位于大鹏湾，且够偏僻，不易被左派发现，碑会保存得久些。在没有其他选择时，当下大家就决定接纳原居民马哥的美意，我们的小碑就建在“鬼吊角”。当时我们还立即决定，5月1日立碑，用第三种方法，租一只游艇直接登陆“鬼吊角”。隔远观看了“鬼吊角”后，时已下午二点，估计再沿着海边走过去，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一来肚饿，二来会误了4时的尾班归船，众人无可奈何，唯有远观一会便就此算了。

吃饭时马哥对我们说，合该那义冢与我们有缘，原因是前不久他与几个村民经由山路去为我们找那义冢，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此时天上突然满布乌云，一派即将会下倾盆大雨的模样，大家此时停止了找墓碑，改为找可挡雨的大树。等找到了一棵可挡雨的大树后，赫然就发现，刻有“先人义冢之墓，公元1912年立”等字的石碑就在树下。此时抬头一看，天上乌云不知为何早已散去，可能是冥冥中有幽魂为他们引路。

既然决定5月1日在“鬼吊角”立碑，在饭桌上，我们为这个行动作了简单的分工。阿津统筹此次行动，他还负责租船，找赞助，与原居民马哥联络等实际工作。卢君与阿蔡则负责购买水泥，烧猪，及运送石碑。我则负责找人撰写祭文及与各地知青联络，尤其是香港的“起锚”而来的知青。原居民马哥则义务为我们准备立碑需用的工具，代买香烛祭品，以及代租登陆的小艇。从4月7日到5月1日这廿多天，我们展开了紧张的筹备。幸亏苍天保佑，一切顺利。4月30日下午，我们几个还在酒楼开了个最后的筹备会，仔细检讨一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期间阿津还拉到了赞助，香港中华中小企总商会名誉会长陈女士赞助了一千港元，支持我们的行动。最难得的是，林女士“五一”当天有事离开香港，但在5月3日，又代表成功逃港的四兄妹补捐一千港元。

5月1日早上8时半，参与建碑的知青们齐集在沙田大学站B出口美心餐厅

外。8时40分，大家一齐步向游艇码头。当我们到达码头时，卢君与阿蔡早已将石碑，烧猪及水泥等物资运到。9时正船来了，大家一起动手把东西搬下船。人和物资上齐了，游艇就“起锚”向吉澳码头开去。

这次参与建碑的知青及其至亲共有59人。这59人绝大部分是当年“起锚”而来的，59人挤在可容100人的游艇上，并不觉得逼仄。船一开行，知青们就不管认识与不认识，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大谈起“起锚”往事来。一时间，在小（抬着祭品的建碑者）小的游艇的每一个角落，“起锚”之声不绝于耳。“起锚”



这两个字，对这群人来说久违了，既遥远又亲切。他们有的说自己当年起了几多板“次”，用什么方法走哪条路，游水游了整整一晚。小小的游艇，时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40年前。大家好像40年前在广州家中串连、密谋一样，又好像回到当年的越秀山百步梯交换消息及进行体

能锻炼，大家更回忆起那些年的重阳节白云山的转运胜利大巡游。有些则说起当年失手被擒，在拘留所里遭受到管教们的不人道对待。说起被送回原单位被批斗的惨况，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起锚7”的张君，向人们诉说他1972年第一次被捕后，被解回海南岛农场，在饭堂里被人吊起来打的惨况。“起锚16”的阿钟，则向人说起当年衣不蔽体的他被绑在厂门口的大树上示众的惨痛经历。这小小的游艇，竟然成了昔日逃亡者怀旧、忆苦与控诉的会场。

言谈中，一位从事饮食业现已退休的黄姓知青对我说，由于其父是资本家，忍受不了歧视及压迫，他们4兄弟全都参加偷渡。的确，在那些年，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逃亡是那些政治贱民的唯一生路。

游艇在知青们的忆苦与控诉中渐渐驶离了西贡海，一小时后进入了大鹏湾。望着北面的盐田港，那些曾经的过来人特别激动。面对这一片曾被自己征服的海水，“起锚15”莫君向人们讲述当年他徒手游过大鹏湾的豪情气概，“起锚14”的阿国则向人们讲述当年两人在海中共用一个塑胶枕头，互推互让的感人情景。突然，一个从事地产经纪业务的胡须仔哽咽着对大家说，当年他“起锚”了十次

才成功，十次都游大鹏湾。一共失去了五位好友，平均每两次失去一个。多年来，他想亲自来这里祭奠他的五位好友，但无机会。今天他再看到这片海水，令他回忆起沉没于这里的五位亡友，不禁悲从中来。他感谢我们，让他终于可以到这里拜祭他的亡友，并表示以后只要我们搞活动，他就一定来，并会多带几个朋友。

上午11时左右，船抵达吉澳码头，马哥和几位村民早已在码头等候。他为我们准备好了立碑的一切工具及香烛祭品。船一靠岸，大家就马上把东西搬上船，随即在机动小舢舨的带引下，游艇向吉澳岛的“鬼吊角”开去。趁这时，我向大家派发祭文。这祭文由“起锚18”陈克治先生所撰。陈君与我同届，是66届高中毕业生，老三届的大阿哥。1968年11月到博罗县插队，曾做过两三年农村民办教师。1973年8月，在台风“黛蒂”正面袭港的当晚，用一条麻绳，将女朋友也拖过大鹏湾。他俩“起锚”出发的第一天，亲眼目睹了几位偷渡集团主脑惨死在边防民兵的枪下。是故我一找他写祭文，他立即应允。陈君很有才气，读书时已是个高材生，又做过几年教师，区区一篇祭文如何难得倒他，很快就交卷。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体，既通畅又押韵，而且又是一首数字回文诗，难度相当高。这篇祭文既道尽了知青的无奈，更道出了逃亡的艰难与危险和失去故友的悲痛，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兹录如下：

知青碑祭文

二〇一四年五月一日立碑

投奔怒海，已数十年。逝者无语，我辈代言。
一言堂主，两句谰言：再受教育，下乡种田。
三思逃避，高压空前。四方邻里，多无幸免。
大哥发配，罗浮山脚。小妹充军，五指山边。
黄金岁月，六七八年。何堪糟蹋，长埋瘦田。
重九观雁，避寒南迁。何不仿效，另觅新篇。
青春年华，不过十年。百般思量，铤而走险。
昼伏夜出，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夜抵海边。
风云无常，变幻万千。台风骤降，电闪浪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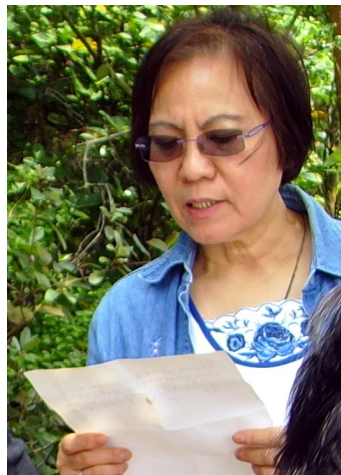
百般无奈，十足信念。九死不悔，逃出生天。
忆我同伴，厄运死缠。音容宛在，已伴海眠。
八方野鹤，绕碑哀叫。七抔黄土，吉澳山巅。
六旬老者，仰天呼唤：故友亡魂，你在哪边？
当年起锚，五亲挂念。杳无音讯，悲痛年年。
今日立碑，四方祭奠。难友不回，哀思绵绵。
三炷清香，默默吊唁。港澳福地，已非从前。
叛国投敌，污名已去，非法探亲，谎话新编。
还我自由，卑微心愿。你我清白，冷对褒贬。
越界蒙难，上苍犹怜。碑记史实，世人怀缅。
两杯敬酒，问地问天。避秦亡灵，何太亏欠？
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梦化，一缕轻烟。

这篇祭文我一派发，马上就有人向我打听出自何人之手，我唯有遥指陈君。派发完祭文不久，游艇在吉澳岛的北面航行到最东端，然后向南一拐，一会儿就到了“鬼吊角”对开海面。

游艇驶到一个废弃了的渔排停下来，那渔排就成了我们的临时码头。我们先跳下渔排，再转上小艇。由于小艇每次只能载十一二人，故我们要分五批上岸。卢君与阿蔡及原居民马哥等十多人第一批，带着工具、石碑及水泥等先行上岸，我则第二批上岸。那日天气好像有心帮忙一样，本来天气预报是天阴有雨的，结果却是阴天不下雨，风浪也很小，所有人都舒舒服服地上了岸。我上岸到达义冢时，马哥已为碑选好了位置，部分人用砍刀清理杂树野草，部分人则在马哥的指挥下，在义冢周围四处散发纸钱。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义冢，不过是在高出海面几米，海浪打不到的地方，孤零零的立着一块约一米高，60CM宽，约5寸厚的麻石碑，上面歪歪斜斜地刻着“先人义冢之墓”几个大字及“公元1912年立”等几个小字。义冢碑的上方长满了浓密的小树，附近看不到有任何墓穴或石碑。可能岁月久了，风雨把墓葬推平了吧。我估计，前人来此，都是对着义冢碑拜拜就算了。纪念碑的位置选在义冢碑的左下方约2米处。靠得这么近，一来受地形限制，二来想同是客死异乡，靠得近些，在阴间也好互相照应吧。

拜祭过山神土地，孤魂野鬼，清理好地方后，知青们开始挖掘。59位知青各行各业都有，其中更不乏建筑及装修方面的人才，这些人这时义不容辞站出来，一展身手。很快挖好了坑，熟手技工往里铺上石头及铁枝，知青陈克治把由他所书的祭文用铁盒装好，亲手埋在碑前。安放好石碑，然后用水泥把坑洞填平，再在碑前铺上“起锚18”阿洁从家中带来的六块磁砖。在这群熟练技工的操作下，大约一小时，纪念碑就安安稳稳地立在“鬼吊角”的义冢碑前。知青们立碑时，有人为久经风雨的义冢碑的字涂上红油，纪念碑立好时，义冢碑也刚刚油好。

下午一时半，59位知青和马哥等几位原居民齐集纪念碑前，祭祀仪式开始，由原广州7中，海南知青“老三”担任主祭。“老三”用纯正的广州话庄重地宣布，香港知青为纪念当年逃港死难知青祭祀开始，先上香，点香烛。他一宣布，知青们就纷纷给新立的纪念碑上香，点香烛，当然也忘不了给义冢碑上一份，一时间“鬼吊角”香烟燎绕。点过香烛后，敬献祭品和奠酒，这（金虹宣读祭文）时，一只几十斤重的大红烧猪被两个人搬来摆放在刚完工的祭台上，主祭“老三”同时奠上三杯白兰地。之后是由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原南京知青金虹女士宣读祭文。金女士用她那清越而不够纯正的广州话朗读祭文。由于祭文实在写得好，加上金女士声情并茂，读到伤感处，天地为之动容，大海为之呜咽。



宣读祭文后是自由发言。作为这次活动筹办人之一的我，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当年不是非法探亲！我们是投奔自由！我们没有背叛祖国！我们只是背叛党国！只是背叛了马列毛主义！”这是我多年的心声，也是绝大多数“起锚”者的心声，因而获得大家的喝彩。的确，当年说我们是非法探亲，连傻子都不相信，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块遮羞布而已。逃出来之后，我们不管去到那里，都会永远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永远是中国人，我们永远都不会背叛祖国。

自由发言后，59位知青和几位原居民围成一个半月型，在主祭的号令下，向着新立的纪念碑行了三鞠躬礼。之后便是化宝，大家把带来的冥镪、香烛全都在纪念碑和义冢碑前焚化。有人不断拨动火堆，希望火能烧透点，让逝去者能多收一些，金虹女士把她刚才宣读的祭文也火化了。

祭祀仪式结束后，部分人留下来清理现场，其余的人就分批乘坐小艇返回游艇。大约二时左右，游艇离开“鬼吊角”向吉澳码头驶去。回到码头后，大家享受了一顿由马哥为我们准备的海鲜大餐。饭后大家在吉澳村闲逛了一会，3时45分游艇再次“起锚”返航了。

返航时的气氛与来时可不一样了，来时像个控诉大会，归时则像个祝捷大会。窄小的船舱里，各人大展歌喉，有唱怀旧抒情的，有唱现代流行的，甚至有唱粤曲，就是没有唱红歌。大家今日终于突破重重阻力，为死难者在海边立了一个碑，了结了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的确值得庆祝。在返航中，我问马哥，会不会有人砸碑。他说，在吉澳岛留守的50~60个老人中没有毛左，他们不会砸，至于外来人则很难说。为了让我们所立的碑能保留多一点时间，阿津与我决定一个月后才把这次立碑行动向外界公布，并且决定以后每年的5月1日都来“鬼吊角”拜祭。当祝捷的歌声结束，游艇即将泊岸之际，我手持麦克风向大家宣布这一决定。我说：“明年5月1日，以后每年都是5月1日，都要来这里拜山！”

这次立碑就这样胜利结束了。现在我们所立的小碑静静的站在“鬼吊角”的岸边，它面对拍岸的潮汐，落日的余辉，向人诉说过去的悲惨往事，它是历史的见证。香港的毛左们，胆敢砸碑的话，难道不怕恶运缠身吗？你们敢砸，我们就再建。我相信总有一天，逃港死难者纪念碑会建到深圳那边去。因为资本主义身体、马列毛脑袋的怪胎，不会长命百岁。

不管将来大型的逃港死难者纪念碑建在那里，“鬼吊角”的碑是我们逃港知青为死难者亲手所建的第一块纪念碑，它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归来后，我写了一首七绝，以志纪念：

南逃恨史枉罪东，起锚往事梦魂中。

今日天涯祭旧侣，北望神州泣西风。

2014年5月12日写于香港

联络电邮 wongtunghon1947@yahoo.com.hk

【林彪研究】

《“571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

——兼驳蒋健先生

舒云

《“571工程”纪要》之所以成为林彪事件中的最大谜团，是因为既没有经过法庭质证，又“疏忽”了发现过程。所以，既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授意，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看过。至于《“571工程”纪要》是否代表林彪思想？也尚须进一步研究。查获《“571工程”纪要》的过程更是扑朔迷离，到底是在空军学院，还是在直升机上？为什么李德生、吴忠等人的说法自相矛盾？《“571工程”纪要》是谁放的？什么时间放的？放的目的是什么？王兰义打扫卫生拿走《“571工程”纪要》的时间是9月13日还是两天后……本来都是可以查清楚的，却统统没有搞清楚。

《记忆》今年第113期发表了蒋健的《〈“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①，蒋先生承认1971年中央专案组和1980“两案”都没有提到“查获”《“571工程”纪要》的细节和时间。也提到吴忠、李德生等当事人说法不一。但不知为何蒋先生故意忽略了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下令查封林立果据点的史实，以主观臆测质疑舒云的调查。

蒋先生的主要观点是：（1）当晚王大璋坐公交车离开空军学院，所以他不可能零点以后离开。（2）舒云说“九一三事件中的告密者是李伟信^②”纯属无稽之谈。（3）《“571工程”纪要》的记录者是于新野，所以是于新野留下的《“571工程”纪要》。（4）空军学院小楼9月17日以后才被北京卫戍区查封，而非舒云借王树德之口所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蒋先生的这些论点完全是主观猜测，缺乏史料证据。笔者就相关问题作一全面的论述。

^① 载《记忆》2014年5月15日第113期。

^② 李伟信（1934—），上海人，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

关于王大璋离开空军学院的时间

我曾在1998年和2007年两次赴上海采访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听他细说1971年9月12日深夜他去空军学院的那段难忘往事。2014年5月30日，我第三次采访王大璋。王大璋的回忆一如既往，他肯定他离开空军学院的时间是零时以后。王大璋说，他在空军学院除见到李伟信和李伟信弟弟李伟军外，没有见到别人。他没有看到台子上有书和本子之类，离开空军学院时只有李伟信一人在^①。王永奎等六人中的陈伦和、许秀绪、鲁莹也说，那天晚上他们没有见到王大璋^②。

而蒋先生主观认定王大璋的回忆错误，举出“邵一海说”。蒋先生认为，“从时间上看，邵一海的调查与王大璋的回忆是冲突的”。“既然李伟信没有开车送他，那么他们（王大璋等）只好坐公交车回去。”而末班车在11点，据此蒋先生臆断“王大璋至少错误地把时间向后推了一小时”。

蒋先生的“逻辑思维”就是这样，在他的眼中王大璋那天夜里没有选择。难道王大璋那天夜里只能坐公交车走吗？王大璋回忆：“9月12日晚上我是11点多一点到的空军学院，12点多一点离开。我开车，李伟信弟弟李伟军指路，回到东交民巷招待所。”^③由此可见，王大璋并非蒋先生臆测的坐公交车走的，所以蒋先生认为王大璋“必须在（晚）11点以前离开空军学院”是完全错误的，而王大璋的说法和邵一海的说法并没有矛盾。

王永奎等六人是何时离开的

我问陈伦和：“您还记得离开空军学院的时间吗？”陈伦和说“不记得了”^④。1981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1）刑字第8号：“9月12日深夜，陈伦和得知南逃计划暴露，即同王永奎等人转移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秘密据点。”原来“两案”审判时没有搞清楚王永奎等六人离开空军学院的准确时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伟信先打发王永奎等六人走，然后打

^① 舒云采访王大璋笔记，2014年5月30日。

^② 舒云采访王大璋、陈伦和、许秀绪、鲁莹笔记，2014年5月30日、6月1日。

^③ 舒云采访王大璋笔记，2014年5月30日。

^④ 舒云采访陈伦和笔记，2014年6月1日。

发王大璋和李伟军走，在于新野和周宇驰到来之前，空军学院小楼只有李伟信一个人。

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据点位于空军学院北门内的东南处，南北各一座小楼；南边小楼一般不住人，北边小楼是林立果落脚处。鲁莹回忆：“9月12日晚饭后，我和郁永珍被陈伦和接到空军学院北边那个楼，也就是林立果住的楼里等着。等了很久，都困了，陈伦和拿来一些信让我和郁永珍到厨房烧，用一个大盆，相当于两个脸盆深的大盆。烧完了，李伟信才出现。李伟信让我们离开，我印象李伟信也开车走了^①。”这与邵一海的说法是一致的：“小楼里，陈伦和带着另外两名没有去北戴河的女青年，焚烧最后一批材料。”^②

鲁莹和郁永珍是邵一海提到的“两个女青年”。陈伦和说：“鲁莹和郁永珍是我奉命从翻译队接出，一起去二高专。是周宇驰和于新野说要她俩一起去广州。”^③鲁莹说，她那天在空军学院小楼里除了见到李伟信和陈伦和外，没有见到其他人。她和郁永珍当晚也去了二高专，是跟陈伦和去的。许秀绪说那天晚上没有见过鲁莹和郁永珍^④。我问鲁莹认识王永奎、许秀绪、王琢吗？她说认识^⑤。鲁莹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女儿，家住空军大院，她本人又在空军司令部翻译队学习，她不可能不认识王永奎、许秀绪、王琢等人。

鲁莹说，到二高专时大约11点或12点，安排在林立果的房间。因为她洗手时感觉香皂有玫瑰香，陈伦和说香皂是香港带回来的。后来又给她们换了一个房间^⑥。虽说第二天王永奎等六个人包括鲁莹和郁永珍是一起去的广州，但当晚他们在空军学院是分乘两辆车去的清河二高专。

许秀绪回忆：“过了12点，王永奎叫我们去二高专。听说第二天走不了了，空中管制，找不到人了。周宇驰、于新野都联系不上，李伟信也找不到了。”^⑦

王永奎等六人是何时离开空军学院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准确的时间，但肯定应该在当晚23时以后。据邵一海的文章：空军学院小楼前，停着一辆卡车，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和王琢，跑进跑出……晚上11点多，快要装车完毕，

^① 舒云采访鲁莹笔记，2014年5月30日。

^②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③ 舒云采访陈伦和笔记，2014年6月1日。

^④ 舒云采访许秀绪笔记，2014年6月1日。

^⑤ 舒云采访鲁莹笔记，2014年5月30日。

^⑥ 舒云采访鲁莹笔记，2014年5月30日。

^⑦ 舒云采访许秀绪笔记，2014年6月1日。

李伟信得到阴谋败露的消息，他立即把大家叫到一起，说：“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也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还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王永奎等人带着已装车的大批器材，慌慌张张地逃走了^①。

李伟信为自己制造了独处时间

蒋先生认为：“邵一海关于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9月12日晚上11点多尚在空军学院小楼的记述，可以认定为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之后，于新野、周宇驰和陈士印也先后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②

蒋先生的意思表面看并没有错，但实际上他有意混淆三拨人（王大璋、王永奎等六人、于新野和周宇驰）的往来时间。蒋先生主观地把王大璋离开空军学院小楼的时间往前提，臆想“王大璋坐公交车”，“安排”王大璋走在王永奎等六人的前面；又故意不提于新野、周宇驰到空军学院小楼的时间。蒋先生这一切，只是想证明并不是王大璋说的“只有李伟信一个人”。“并非舒云调查的那样，只是李伟信一人。”

事实上李伟信在23时多接到周宇驰“暴露了”的电话后，先打发走王永奎等六人，又在零点以后打发走王大璋和李伟军。这时于新野和周宇驰还没有来到空军学院。王大璋、陈伦和、许秀绪、鲁莹都证实，他们当晚在空军学院小楼里没有见到于新野和周宇驰^③。“只有李伟信一个人”，并不只是王大璋和舒云的说法，蒋先生掉书袋一般引用邵一海的文章，为什么就“疏忽”了邵一海也提到“只剩下李伟信一个人”？

据邵一海文：“乱糟糟的小楼里，只剩下李伟信一个人。不久，又来了一个于新野，他是在密谋南逃的黑会散会后回到这里的。”^④这就是说，9月13日零时后于新野从空军大院到空军学院小楼时，只见到李伟信一个人收拾残局。周宇驰来时“环视了一下凌乱的房间，问道：‘许秀绪他们呢？’于新野说：‘他们刚

^①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② 载《记忆》2014年5月15日第113期。

^③ 舒云采访王大璋、陈伦和、许秀绪、鲁莹笔记，2014年5月30日、6月1日。

^④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走，到二高专待命去了。’‘来不及叫他们一起走了!’”^①

从周宇驰这段话看，周宇驰并不知道王永奎等六人去清河二高专的事情。周宇驰是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指定的总负责，他没有下令让王永奎等六人走。于新野当晚分工负责监督王飞安排去广州的名单，他也不可能下令让王永奎等六人走。这就是说，是李伟信自作主张让王永奎等六人去清河二高专待命的，这样李伟信就给自己安排了独处的时间。

李伟信为什么半夜去接王大璋？

王大璋回忆：“（9月12日）晚上10点多，李伟信和他弟弟李伟军来了，李伟信开了一辆嘎斯69，他们要我一起上车。在车上，李伟信与我闲谈，说‘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当时我非常惊讶。我们的车停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前，我不知道是空军学院，这时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了。”^②这是李伟信当天的第四次外出。

王大璋到空军学院的时间是23时。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李伟信在隔壁房间退录音带，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干净。李伟信叫王大璋把林立果房间的壁柜撬开，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李伟信又叫王大璋把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王大璋在楼上一共只呆了五六分钟。而李伟信和李伟军13日零点左右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③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④

这个时候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为什么李伟信还要把局外人王大璋接到空军学院来呢？假如李伟信是告密者，他是决不敢打电话告密的。不仅因为空军通信总站前不久出了窃听事件，而且林立果本人也在搞窃听，他偷录了他妈妈叶群和黄永胜的通话。这是李伟信非常清楚的事情，他怎么敢用电话告密呢？白天“外出”李伟信可以借口买东西，晚上“外出”他有什么借口？尤

^①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②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298页。

^③ 即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林立果的五个据点之一。

^④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296—299页。

其是在火烧眉毛的这个夜晚。而接王大璋来研究到上海后如何让8341部队下飞机，这是一个对周宇驰、于新野都说得出口的理由。而事实上李伟信与王大璋讨论这件事是荒谬的。王大璋虽说是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儿子，但他只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难道李伟信想把“卸下”8341部队的责任推到王大璋身上？

或许我们能从李伟信对王大璋说的那句话看出一点端倪。“被打成反革命”，为什么要王大璋“声张正义”？这或许是李伟信真实心态的流露吧？李或许想脚踏两只船，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谁输谁赢，他需要狡兔三窟？

于新野、李伟信提出是不是能不走

1971年9月12日凌晨1时许，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据点”^①。李伟信的供词：“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我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跑。’”^②周宇驰让于新野去西郊机场招待所接陈士印。陈士印到空军学院后，周宇驰与他谈话，于新野和李伟信在楼上收拾东西。……李伟信终于开口了，他试探地说：“这么远，直升机跑得出去吗？”于新野也犹豫了：“就是跑成了，老婆孩子怎么办？”两人“统一”了思想，把周宇驰请上楼来，要周宇驰再考虑一下。周宇驰过了一会才垂头丧气地说：“不走就要坐牢，坐牢的滋味就好受呀？！”接着又一阵难堪的沉默。于新野又鼓起勇气说：“不要走，先等等，看看情况……”“那可不行，错过机会，要走就走不成了。”周宇驰打断于新野的话，把脸一沉，“平时忠于忠于的，关键时刻不听指挥可不行！”于新野说：“那也要先和北戴河联系一下。”周宇驰厉声说：“不用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了。走吧，快走！……”

凌晨1点40多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携带着几个装着三万元美钞和许多绝密文件的手提包，上了车，发疯似地向沙河机场急驰而去^③。

这说明于新野、李伟信并没有“北上”的心理准备，而周宇驰当晚也是在准备去广州，只是在接到林立果“北上”电话才连夜安排家事，硬拉于新野、李伟

^①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24号，空军清查专题材料之三。

^②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24号，空军清查专题材料之三。

^③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70页。

信走的。

谁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小楼？

舒云确实说过凌晨1时40多分，最后一起离开空军学院的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舒云也说过“李伟信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这并不是蒋先生说的“乌龙”，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最后一起离开和李伟信最后离开并不矛盾。

李伟信“最后离开”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中国“尊者为先”的传统，出门时地位最低者走在最后，负责锁门。所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一起离开空军学院小楼时，地位最高的周宇驰走在前面，于新野是空军司令部副处长紧随其后。李伟信是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地位最低，当然最后一个离开。

所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最后一起离开和李伟信最后离开都没有错。奇怪的是，王兰义发现《“571工程”纪要》时，大门虚掩着！是李伟信没有锁门？还是有人在李伟信走后又有人进来过？

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文件放在茶几上？

据邵一海文：1971年10月9日，一个带有拉链的本子，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这已经是“九一三”事件后的第26天。周总理把本子放在手中掂了掂，像是要估量它究竟有多少重量：“唔，这就是那个红本子。”^①这就是那个红本子？难道周恩来早有耳闻？为什么它会出现李伟信善后的屋子里？来不及烧掉吗？来不及带走吗？周宇驰、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都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最重要的本子却拉下了？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

王兰义回忆：北楼烧得不多，南楼烧得多。南楼一般不住人，他们最后一次住、办公还是在北楼。两天的报纸没拿，9月15日晚上我从办公室回家，路过北楼，我推门进去，很臭，像尸体腐烂的味道，我汗毛“扎”起来，是不是死人了？我看见桌子上散乱书报，其中有一个红本子，地上纸箱、皮箱。储藏室，端

^①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去的鱼还是整条，已经长了很长的毛，臭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旁边有个条子：请勿动。我继续到各个房间看，我翻开本子，非常正规，目录一笔一划，没写完，背面才写完。又翻开一页白纸，没当回事。《“571工程”纪要》，目录一二三四，黑墨字的楷书，是谁写的，搞技术，雷达导弹。还专门传达，我以为搞了技术工程。常（党？）委召开会，我把王志松喊过来，对他说小楼里边很乱，很臭，烧了好多东西，找你们的人打扫卫生，我一会去。王、高来了，我领他们转一圈。我整卫生，王、高翻看红本子，我站一会我走了，我不过问。那天晚上叫我（把本子）拿走，我说有规定不让动，于新野说过里面东西不许动。^①

9月16日20时，他们（王兰义等）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②

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九一三事件两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571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③更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天了，才想起查封林立果最重要的“据点”？难道林立果最重要的“据点”在9月13日没有按照周恩来的命令查封？

周恩来的五条命令和查封情况

1971年9月13日4时左右，周恩来向吴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下达命令：（1）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2）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3）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4）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

^① 舒云采访王兰义笔记，2010年1月13日。

^②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6页。

^③ 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年17期，第25页。

单位的警卫力量。(5) 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①。蒋先生是知道这段史实的，他引用了王媛媛文章中另外一段，却避而不谈同一篇文章中周恩来的五条命令，反而指责舒云借王树德之口所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就查封了空军学院小楼。王树德还活着，查封小楼的不止王树德一个人。蒋先生貌似全面引用史料，实则断章取义，这哪里是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态度！

请看林彪两处驻地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查封情况。林彪飞机9月13日零时32分起飞，当天半夜值班秘书于运深就听见房顶有沉重纷乱的脚步声。留守毛家湾的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照团长张耀祠的命令，半夜布置8341部队就上了房顶，占领了制高点，同时把值班秘书也看管起来^②。至于北戴河林彪别墅，也同样被严密查封。

聂荣臻秘书周均伦回忆：1971年9月12日聂帅回到北京，管理员老丁是第二天早上返回北京的。他回来后告诉我，北戴河被封锁了，谁也不让走，后来看是聂帅的车子才放行了。管理员老丁还说，9月12日半夜，北戴河中央别墅甲区还打了枪。中央别墅区分甲区乙区，聂帅住在乙区，林彪住在甲区。甲区打枪？怎么回事？搞不清楚。^③

林彪天天坐在黑房子里，手无缚鸡之力，既不打电话联络，又不找人谈话，而且他身上也没有枪。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两处住所毛家湾和北戴河别墅都被查封，戒备森严。从事后反馈看，周恩来的五条命令中，另四条都严格执行了，北京的所有机场在九一三早上已经被陆军站上岗了，每一架飞机前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而林立果手握实权，又活动异常，已经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又有周恩来的查封命令，怎么可能对林立果的重要据点空军学院“网开一面”？

9月13日晚上查封空军学院小楼

林立果在北京有五处据点：空军学院小楼（北楼和南楼）、西郊机场工字房、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清河第二高等专科学校、幸福村干部休养所。林立果这五处据点中最重要的是空军学院小楼，其次是西郊机场工字房。既然周恩来在九一

^① 王媛媛《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原载《文史精华》2006年第4期

^② 参见蒋廷贵文 舒云整理《北京毛家湾的九一三之夜》，原载《新史记》2011年第4期。

^③ 舒云采访周均伦笔记，2014年6月11日。

三事件后三四小时后就下令北京卫戍区“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以周恩来办事的干练、效率和手段，他也决不会允许几天后才查封林立果最重要的据点空军学院小楼。北京卫戍区怎么敢不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怎么可能拖到四天后才执行？！

王树德回忆：“9月13日晚上，我们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三个经常活动的‘据点’都看守起来了。”^①

王树德，河北肃宁人，1945年参加革命，一直担任军队保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经验。1959年2月北京卫戍区成立，他被选调到保卫处当干事，后升任副处长、处长。本来北京军区调他任保卫部副部长，而北京卫戍区不放，说这里更重要。1968年北京卫戍区升级，晚了一两年，王树德的职务总算得到提升，担任北京卫戍区保卫部副部长。1971年春升任部长。

王树德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政委杨俊生召开处长以上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已经摔死，怕还有同党，所以非常机密。当天夜里，林立果的三个经常活动的据点空军学院小楼、西郊机场工字房、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分别被看守起来。因为最重要的是空军学院小楼，所以由我带仪仗营一个加强班，全副武装，子弹上膛，还带着轻机枪，秘密进入空军学院小楼。两座小楼都被我们查封了。随我一起进驻空军学院小楼的干部还有北京卫戍区工兵处刘副处长，通信处阎参谋，仪仗营1连连长刘建章。我们进去时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们查看了每一个房间，包括厨房，都没有看见纸灰和垃圾。桌面、地面也没有文件、书本或碎纸，都打扫干净了，总之我没有看见《‘571工程’纪要》。我在小楼里住了20天，连空军学院大院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饭都是战士打进来吃。”^②

如果说王树德在9月13日当晚就查封了小楼，王兰义又如何能在9月15、16日两进小楼，并拿出《“571工程”纪要》？王树德分析：“空军学院这座小楼每天都要打扫，应该是9月13日空军学院负责打扫卫生的人进来时拿走的《‘571工程’纪要》小本子。9月13日夜里查封后，没有外人进来过。”^③

那么是王树德记错了时间，还是王兰义记错了时间？为什么又把与发现

^① 舒云采访王树德笔记，2010年8月18日。

^② 舒云采访王树德笔记，2014年6月24日

^③ 舒云采访王树德笔记，2014年6月24日。

《“571工程”纪要》的王兰义等人监禁起来？中央专案组似乎对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过程并不关心，也根本没有查证，难怪吴忠、李德生等关于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说法自相矛盾。例如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①。例如李德生说：“（1971年9月13日）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②但四年后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关于《“571工程”纪要》的说法变了：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李德生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③

《“571工程”纪要》到底是在哪里发现的？是在什么时间发现的？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是却没有对发现《“571工程”纪要》的时间、地点进行侦查。这是为什么？

《“571工程”纪要》是谁留下来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林彪和林立果住所，以及直升机现场，查抄了大批材料，但《“571工程”纪要》到底是在直升机现场还是在空军学院小楼发现的？是谁放的？为什么没有拿走？蒋先生臆断《“571工程”纪要》是于新野记录，因此也是于新野留下的，这仅仅是蒋先生的推论，并无可靠的证据。蒋先生的逻辑从根本上错了，难道记录者就是唯一保管者吗？答案是否定的。记录者并不一定就是保管者，不能排除别人保管并遗留下来的可能性。于新野或周宇驰不可能留下《“571工程”纪要》，理由有五：

第一，于新野、周宇驰不负责保管文件，林立果的文件都是程洪珍保管^④。9月12日傍晚，程洪珍随林立果到北戴河去了，不在空军学院小楼。

^① 王媛媛《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文史精华》2006年第4期，第16页。

^②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11期，10—11页。

^③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29页。

^④ 舒云采访许秀绪笔记，2014年6月1日。

第二，于新野、周宇驰不负责保管文件，就不可能保管《“571工程”纪要》吗？由于它关系到身家性命，所以标明“特级绝密”，交给别人保管不一定放心，留在自己手里更安全。但请注意一个事实，周宇驰临死把随身携带的伪造“林彪手令”和伪造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撕成碎片。“林彪手令”含义不清，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就是几句问候，却撕成了五六十块的碎片，在法律上这是销毁罪证。如果周宇驰保管《“571工程”纪要》，怎么可能将它完好无损放在空军学院小楼的桌子上？好像“自首”一般。这不是周宇驰的风格，否则他不会撕碎“林彪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此时的周宇驰已经意识到毛林摊牌在即，他追随林立果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在临走前一定要销毁那些可能事涉林家的材料，尽量不授人以柄。留下《“571工程”纪要》无异于主动送上自己的罪证，不仅陷林家于不义，更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周宇驰决不可能留下或故意留下《“571工程”纪要》。

第三，于新野对“小舰队”文件的态度更是谨慎，当晚取消了去广州的决定，王飞把拟定去广州名单撕毁冲进马桶，而于新野却把去广州的名单草稿小心装进包里，带上了直升机^①。直升机上查获的文件，还有于新野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活页本，共28例，126页；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计划的记载；1971年8月26日，于新野记录的“小舰队”整风会议稿等^②。如果《“571工程”纪要》由于新野保管，他怎么可能不当成最重要的宝贝带走，而放在空军学院小楼里。而且周宇驰、于新野都没有放《“571工程”纪要》的机会。

第四，空军学院小楼经过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的收拾，远没有《“571工程”纪要》重要的文件都打包带走了。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离开后，又由李伟信负责彻底清理，柜子都清空了，该烧的也都烧了，为什么独独留下“特级绝密”的《“571工程”纪要》？而且布置成想带走却又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样子？

第五，从周宇驰、于新野坚决自杀的举动看，他们也没有故意“遗忘”的可能。如果像某些人说的“显示”，是显示不出来的，因为《“571工程”纪要》使用的是“B-52”代号，并没有说杀毛。如果不是李伟信的解释，谁能知道这是一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第70页。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第70页。

个什么东西？这说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并不想暴露他们的企图。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故意留下呢？

《“571工程”纪要》是不是李伟信留下的呢？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晚李伟信是唯一在空军学院小楼的独处者。但是问题也来了，李伟信不负责保管文件，而且林立果并没有把全部底牌都交给李伟信。李伟信让王大璋把林立果屋里的柜子撬开，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①。这说明林立果临走清空了柜子，却仍然上了锁。李伟信怎么有机会拿到《“571工程”纪要》呢？难道是偷出来的？负责保管文件的程洪珍在押，这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问题，但是，案审十年却没有追踪《“571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人为制造了众多谜团。李伟信是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小楼的，但他紧跟着前面的周宇驰、于新野出门，他似乎也没有“作案”时间。那么是李伟信在独处那段时间放的？难道他不怕被于新野、周宇驰发现吗？如果不是李伟信放的，那又是谁放的？

李伟信是不是告密者？

蒋先生试图证明：“从李伟信当夜的上述举动以及次日凌晨跟随周宇驰、于新野劫持直升机北逃的举动来看，笔者认为，舒云所说的‘九一三事件中的告密者是李伟信’^②纯属无稽之谈。”

蒋先生列举的李伟信举动，是从邵一海和张聂尔书中抄来的，不能证明是李伟信当天的全部活动。舒云在本文中列举了李伟信当天的更多活动，但也不能肯定这就是李伟信当天的全部活动。蒋先生用李伟信的部分活动来证明李伟信不是告密者，这是不是“无稽之谈”呢？

李志绥^③回忆：“毛泽东对武则天推崇备至，有一次他同我谈起武则天，（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方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野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④有需要告密者就有告密者。李志绥说，林立果

^① 舒云采访王大璋笔记，2014年5月30日。

^② 舒云博客：《九一三事件谁是告密者？（二）》。

^③ 毛泽东保健医生。

^④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社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18页。

的情报是小苏^①通过妻子谢静宜^②报告给毛泽东的。但是苏延勋在空军司令部上班，如果没有林立果身边的告密者，他如何知悉并报告林立果的一举一动？

林立果身边有五个人，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的举动看，他们是“铁杆”，刘沛丰、程洪珍当晚随林立果去了北戴河，刘沛丰上了专机死在蒙古，程洪珍被收押，刑满后投靠兄嫂，给人看大门，孤身一人，贫病交加中年早逝，结局潦倒。

那么李伟信呢？他是上海人，头脑灵活，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他画的毛泽东巨像。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比程洪珍更有“报告”的条件。林立果等起草《“571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李伟信则在一边端茶倒水，目前所有关于《“571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

1980年10月13日，李伟信在法庭交代：《“571工程”纪要》写好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我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和主任（叶群）那里。^③经过中央专案组查找，根本就没有找到《“571工程”纪要》的正本。

李伟信在监狱中有三件蹊跷事。第一件蹊跷事，9月13日清晨，直升机迫降，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李伟信却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他对前来查看的张辉灿^④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⑤。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⑥

第二件蹊跷事，李伟信在法庭上说，感谢组织上给他配眼镜。监狱犯人有戴眼镜的权利吗？江青秘书阎长贵被抓后，第一件事就是没收眼镜^⑦。因为眼镜碎了可能是自杀“凶器”，为什么李伟信这个犯人例外？

第三件蹊跷事，据知情人透露，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对他说：李伟信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整天坐在狱警办公室里，累了就在长椅上打盹。

^①苏延勋，空军机要局参谋。

^②曾任毛泽东机要员。

^③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页。

^④张辉灿，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曾任黄永胜秘书。

^⑤舒云采访张辉灿笔记，2012年5月25日。

^⑥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年17期。

^⑦舒云采访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24日。

所以他有条件和女狱警谈恋爱，还一起逛公园。据悉李伟信出狱后与女狱警结了婚，并事业有成。此事尚须进一步考证。如果是事实，那么李伟信是在坐牢吗？

总之，《“571工程”纪要》是否是李伟信留下的，还有待调查，但这并不影响李伟信的告密者嫌疑。

周宇驰当晚三次回到空军大院家中

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他的第一方案在南方谋害毛泽东破产，决定启动第二方案南逃广州。兵分两路，他带刘沛丰、程洪珍到北戴河，北京这边由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第二天一大早分头飞往广州。

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接到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周宇驰首先向他宣布：“现在形势不好，首长（林彪）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随后布置了机群任务^①。

17时多，周宇驰打电话叫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来。18时许，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小楼，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在林立果指挥下，几个男女正在紧张地收拾行装。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件，横七竖八；散乱的文件、书本，乱七八糟地丢弃在桌子上、沙发上、地面上；厨房里烟熏火燎，纸灰飞扬……看到王飞进来，林立果匆匆说了几句：“现在情况紧张，要立即转移，具体情况等周宇驰来了再给你们谈。”又自顾收拾东西去了。……不久，周宇驰一阵风似地冲进来了，讲了大概情况，掏出一张纸片宣布去广州的具体方案。最后周宇驰宣布：“这是命令，大家要坚决执行。现在时间很紧，要抓紧。今晚由王副参谋长、于新野（空军党办副处长）把（去广州）名单定下来，找他们开个会。你们先去准备，我随后就来。”^②但是当晚周宇驰并没有出现在王飞主持的会议上。

21时左右周宇驰开车回到空军大院家中，让妻子王圣兰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说明天早上7点半飞机，和孩子到广州去。“在王圣兰收拾东西的时候，林立果打来电话。王圣兰听到周宇驰和林立果讲到了‘北上’的问题。

^①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②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8页。

问丈夫：‘北上是要去哪儿呀？’周宇驰说：‘上蒙古，到那儿找林立果去，从那儿看情况再去苏联’^①。”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北上”的电话后，“匆匆忙忙带着妻子王圣兰和两个儿子直奔西郊机场。”^②

周宇驰当晚回了三次家。第一次回家并没有接到林立果的“北上”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周恩来还没有查问林彪飞机，无论是王飞在空军大院办公楼召集的会议，还是李伟信等在空军学院小楼收拾东西，一切都还在按部就班，周宇驰怎么可能接到林立果的“北上”电话呢？由此可见当年中央专案组的胡乱办案。

而另有材料说22时多，周宇驰在家中接到叶群电话后，即带着老婆和两个儿子窜到西郊机场，企图乘机外逃，因中央正在追查256号飞机调山海关机场和下达了关于256号飞机放飞的规定，阴谋未能得逞^③。周宇驰在家中接到叶群电话了吗？叶群会给周宇驰打电话吗？周宇驰第一次回家的目的就是把妻儿接到西郊机场，准备第二天一大早飞往广州，这时还不可能有“外逃”。23时左右周总理查问林彪专机，情况突变，这才有了周宇驰的第二次、第三次回家。

周恩来查问飞机，周宇驰第二次回家

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交代：“12日晚10时以后，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打电话告诉我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事，我知道一定是中央查（察）觉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于是我就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又给已去山海关的潘景寅（林彪专机飞行员）打电话，假借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林彪使用。”^④

胡萍从候机室跑回宿舍，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吴法宪来电话，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是不是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此时，周宇驰已经把妻儿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他立即打了三个电话，首先报告林立果，两人商量立即中止去广州的准备。所以接着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正在开

^① 明晓、赤男著《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38—439页。

^② 向红《四十年有感》，《记忆》77期，2011年10月21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24号，空军清查专题材料之三。

^④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24号，空军清查专题材料之三，第76页胡萍1971年10月4日交代。

会的王飞“暴露了，不搞了”。^①周宇驰的第三个电话通知李伟信“暴露了”，李伟信叫王永奎等六人撤到清河二高专去。

23时左右，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候机楼，胡萍让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到工字房去，看看周宇驰在不在，告诉他吴司令来西郊机场查飞机了^②。小孙立即跑到工字房，看到里面灯光很暗，门口的车库里，停着一辆伏尔加。她刚推门进去，周宇驰从里面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小孙把胡萍的话告诉了周宇驰，周宇驰神色慌张地说了一句：“好吧！”就立即回到房间里去了。小孙跑回来，把见到周宇驰的情况告诉了胡萍。胡萍要小孙“再去周宇驰那里看看，让他给我写个条子来，我该怎么办？”小孙再跑到工字房，屋里的灯灭了，什么人也没有，车库里的汽车也不见了^③。周宇驰上哪儿去了呢？既然广州去不成了，他就把妻儿送回家去了。这是他第二次回家。

王飞在司令部办公楼召集的会议从21时多开始，研究第二天去广州的名单，分成四组“保护”黄吴李邱。“大约21时30分，鲁珉来到办公楼。……不久于新野也到了。”^④鲁珉是从医院来的，林立果要他去暗杀毛泽东，他不去又不敢反抗，由当医生的妻子用盐水把眼睛搞红，住院去了。鲁珉回忆：我到时他们已经开会了，……王飞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说：“刚才讲的全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讲过。散会。”这样，我又回医院，回到医院大概将近12点。^⑤

晚12时许，于新野、李伟信在空军学院黑据点里告诉王永奎、王琢等人，“这个据点暴露了”，让他们到原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据点等电话。王琢、陈伦和开车拉着王永奎、许秀绪等五人到二高专据点隐藏起来。^⑥

周宇驰先通知王飞，后通知李伟信，应该是紧接着，但从现在的史料看，时间是模糊的。鲁珉说回到医院的时间是将近零时。即“23时多”王飞就接到了周宇驰取消第二方案的电话。而李伟信这边“24时许”才接到周宇驰“暴露了”的电话。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的时间极其混乱，因为当事人没有刻意看表，所以都是大概时间。而不论是中央专案组，还是1980年的“两案”审判，都没有搞清楚九一三事件中的基本情况。

^①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24号，空军清查专题材料之三。

^② 工字房在西郊机场候机室东南三四百米处，是林立果的五个“据点”之一。

^③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237页。

^④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229页。

^⑤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05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24号，空军清查专题材料之三。

除了时间混乱，空间也极其混乱。中共中央24号文件说“晚12时许，于新野、李伟信在空军学院……”，是不对的。陈伦和回忆：我们去二高专前只见到李伟信，没见到于新野。^①当时于新野还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参加王飞召集的会议，不可能出现在空军学院小楼里。

周宇驰命令潘景寅“马上走”，周第三次回家

周宇驰第二次回到空军大院家中时，接到林立果临去机场前打的“北上”电话，即按第三方案到苏联去。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声音很大，因此从窗户那里飘来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上哪儿？上哪儿？哦，北上？北上啊！”^②

23时54分，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北上”电话，给潘景寅打了一个电话，说“马上走，林立果已经出发了”。这个时间是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记录下来的。有人认为这个“马上走”电话不是周宇驰打的，那么谁还能给潘景寅下命令呢？下命令者应该知道林立果的“北上”。胡萍不知道“北上”，他不可能命令潘景寅“马上走”。现在看，知道“北上”的只有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叶群和林立果已在路上，所以只有周宇驰能给潘景寅打这个电话。

顺便说林立果在山海关机场停机坪打电话，我的原文是：“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事后看很可能是打给周宇驰，让周宇驰‘北上’。”^③而蒋先生故意删去“很可能”，进而指责“不靠谱”！机场停机坪的电话正如蒋先生所说，“当然不能直拨周宇驰家中”，但不能直拨，不等于要不到北京。70年代初军队内部电话是靠小总机转大总机，层层接转，有时直线不通还要迂回，一个电话可能五六个甚至十多个总机在中间接转。不要说林立果打的这个电话是一号专机旁边的电话，就是机场普通电话，通过总机也一样能要到北京。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的“北上”电话，应该是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前打的。林立果在停机坪打电话，通过机场总机接转，要北京不是问题。

^① 舒云采访陈伦和笔记，2014年6月1日。

^② 舒云采访周宇驰妻子王圣兰笔记，2003年12月。

^③ 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年17期，第30页。

“如此沉着”，“周宇驰是否还在家中”，更不是林立果此时的考虑。打电话是一回事，电话能不能接通又是另一回事。当然通过众多总机转接很慢，话音衰减严重，事实证明林立果并没有要通这个电话。

在林立果到达山海关机场前，周宇驰还在家中接到程洪珍的一个电话。“被李克修^①叫醒的程洪珍打电话找到仍在北京的周宇驰，报告说8341部队的宁某某打电话给机场，要卡住从北戴河来的小车不让它走等情况。周宇驰急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②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跑吧！’”^③

大概就在这时，周宇驰决定让弟弟把母亲带走。“他随后送弟弟去火车站，并请求弟弟将其大儿子带走。在把弟弟和大儿子送到火车站后，周宇驰又把妻子和小儿子送回空军大院的家。”^④周宇驰第三次回家没有下车，直接走了。

李伟信 9月12日的四次外出

李伟信9月12日半夜去接王大璋，是当天的第四次外出。当天下午他有一次外出。王兰义回忆：9月12日下午2点多，小楼里几个人吃完饭，回小楼去了。我也回家自己弄饭吃，吃完不久，陈伦和^⑤来电话，要我给李伟信派个车，说他要进城买东西。我派好车，骑自行车到小楼告诉陈伦和：“车已派好，停在大马路上。”陈伦和说，李伟信自己会去，叫我回去。这时已经是3点10分左右了。^⑥这时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回到北京，林立果是否得知？还有心思吩咐李伟信去买东西？或者是李伟信自作主张？他究竟去干了什么？陈伦和要车的时间正是王大璋到北京的时间，或许借口买东西就是要将王大璋从首都机场接到西郊机场？这是李伟信的第一次外出。

王大璋说：“父亲为什么要我去北京通报？因为于新野讲过，说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父亲早点给他们打个招呼。……我立即乘民航飞机去北京，到

^① 应该是李海彬，李海彬是空军34师调度室主任，夏天专门到山海关机场保证专机任务。

^② 英语司令员译音，林立果代号。

^③ 明晓、赤男《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60—461页。

^④ 向红《四十年有感》，《记忆》77期，2011年10月21日。

^⑤ 空军司令部翻译。

^⑥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北京是下午3点。李伟信来接我，开了一辆嘎斯69，一个多小时后，到了西郊机场一间平房^①。大约4点半以后，我听到汽车响，林立果、周宇驰回来了。”^②谈完话，李伟信开车把王大璋送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这应该是李伟信当天的第二次外出。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召集部属简单开了个会。许秀绪^③回忆：九一三事件前几天，我们就住在空军学院小楼的北楼。9月12日晚饭后，天都黑了，屋里开了灯。林立果给我们讲了一个话，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8341部队不可靠。以前没讲过，这是第一次摊牌。林立果叫我们收拾东西，第二天到西郊机场集合，保卫林副主席，到广州去。^④

林立果召集的会议匆匆结束，与会者分头行动。

陈伦和开着蓝色伏尔加，跑了三趟，大大小小20多个箱包，装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后，这些箱包除四个重要的公文包由刘沛丰拎下飞机，其余都留在飞机上。四个重要的公文包最后也随着林立果、刘沛丰重新上了三叉戟飞机。除了这20多个鼓鼓的箱包外，所有林立果等人的东西全部被缴获。^⑤

林立果临走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把东西收拾一下，毛家湾以及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李伟信根据林立果的安排，开大屁股吉普车和王永奎、许秀绪到了毛家湾，把林立果房间里的录音机、录像机等电器装上车，拉到空军学院小楼的北楼，这是李伟信的当天的第三次外出。21时以后，一切还都是按林立果临走安排的第二方案有条不紊地准备。许秀绪回忆：王永奎帮助李伟信弟弟李伟军装车。我们也不好问，第二天走不走，“文化大革命”连国家主席都倒台了，上层矛盾，谁都不敢说什么，都闷着。^⑥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李伟军。他是李伟信的弟弟。李伟信身上的问号就够多的了，他还带来一个弟弟李伟军？听名字倒像哥俩。据说李伟军是上海搞机械技术的工程师，林立果电器多，李伟信找李伟军来维修电器，应该是征得林立果的同意。我问许秀绪，李伟军长得像李伟信吗？许秀绪说不太像，有点胖。

^① 即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的五个据点之一。

^②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297页。

^③ 许秀绪，空军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

^④ 舒云采访许秀绪笔记，2014年6月1日。

^⑤ 参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⑥ 舒云采访许秀绪笔记，2014年6月1日。

弟兄俩长得不像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李伟信本身就是“秘书”，为什么还要再找个“秘书”？

“陈修文照片”案与舒云无关

蒋先生在《〈“571 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中对舒云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攻击和造谣，其中有这样一段不实之词：“甚至在其^①文章中还出现过把被周宇驰打死的陈修文的照片当作‘林立果高参周宇驰’的照片贴出来这样的荒唐事。”^②荒唐者是蒋先生而不是舒云。为什么蒋先生要扯出无关的陈修文照片？

“陈修文照片”确实被《文史参考》杂志社美编误用，但与舒云无关。舒云向《文史参考》投稿的同时，也给了潘景寅的照片，却从来没有给过陈修文或周宇驰的照片，也没有在文中提到陈修文的名字。是杂志社美编从百度百科搜到周宇驰的照片，放在舒云文章中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搜到的不是周宇驰照片，而是陈修文照片（至今百度百科周宇驰照片仍是陈修文的中尉照片）。

2011 年 11 月 7 日，陈修文儿子将《文史参考》和舒云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60 万元。2013 年 6 月 17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驳回对舒云的全部诉讼请求。陈修文儿子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蒋先生如此关注“陈修文照片”，居然不知道舒云从未因陈修文照片一事道过歉？而且用错“陈修文照片”与蒋先生关于《“571 工程”纪要》一文毫无关联，而蒋先生却拿“陈修文照片”来攻击舒云的调查，只能说明蒋先生并不是在探讨问题，而是借题发挥，变相地贬损本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

^① 指舒云。

^② 舒云《“九一三事件”揭秘——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文史参考》2011 年 5 月（上），第 25 页。

【林彪研究】

林彪集团北京黑据点是何时被查封的？

蒋 健

王媛媛在其《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一文中提到：

9 月 13 日凌晨 3 时多，周恩来向吴德和吴忠正式下达五条命令，其中的第三条命令就是“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凌晨 4 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随后与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一起“共同拟定了紧急战备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之后，“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 5 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而且，“到 13 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①

也就是说，按照王媛媛的描述，林彪集团在北京的 5 个黑据点在 9 月 13 日的早晨已经被查封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无独有偶。“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者”舒云也曾撰文说：“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 月 13 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②

林立果的 5 个黑据点到底是何时被查封的？

^① 王媛媛：《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文史精华》，2006 年 4 期，12—14 页。

^② 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 年 17 期，25 页。

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之后的9月15日和16日，王兰义、王治松和高文勇等人怎么还可以多次自由出入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并发现和转移了

《“571工程”纪要》呢？

笔者认为，显然是王媛媛们搞错了林立果五个黑据点被查封的时间。

理由如下：

首先，无论是吴德的回忆①，还是吴忠的回忆②，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其次，无论是吴德、吴忠，还是周恩来，当时都不可能知道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所在，怎么可能派人立即去查封呢？

第三，根据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的回忆，他和李伟信的弟弟李伟军，按照约定，在9月13日上午没接到李伟信的电话后，才于当日晚些时候离开位于东交民巷（当时改名为“反帝路”）的空军招待所，即“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之一，坐火车回上海。③而这个“黑据点”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以及吴忠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是最该查封也最好查封的一个据点，可结果呢？这就表明王媛媛所说的9月13日早晨“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违背事实。

第四，除了与两架外逃飞机直接相关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与林立果小舰队相关的人员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就被扣押的；鲁珉是9月14日中午去向李德生自首的④；江腾蛟是9月14日下午被王辉球派人到他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家里叫到空司办公室后坦白的，但他的家人仍然具有人身自由，比如江腾蛟的夫人李燕平（萍）9月15日还能到北京火车站与前来“串词”的王维国亲信碰面，并以字条“周、于已自亡，李被他家接去，东西都卖光了，我们也没办法”来传信⑤；小舰队其他人员都是在此之后的几天陆续被捕的，有的还是在他们安全抵达广州以后才被拿获的。实际上，所有的小舰队人员都不是在“5个黑据点”里被扣押的，仅此就可表明，王媛媛的“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这种写法带有很大的演义成分，完全背离历史真实。

①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

② 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

③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298页。

④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427-428页。

⑤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299页；于鹏飞，杜鹃：《“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记忆》，94期，2013年2月28日。

第五，吴德回忆：9月13日早晨，“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假如周恩来当时真的下令卫戍区部队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那么他一定会通知空军予以配合，就像他命令卫戍区部队进驻机场时会要求空军予以配合那样。不然，卫戍区部队与“黑据点”所在的各个空军单位的警卫部队发生误会和冲突怎么办？从王治松和高文勇这样的空军学院领导看到《“571工程”纪要》时的表现和态度来看，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卫戍区部队来查封他们单位内的林立果“黑据点”这回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吴法宪回忆提供的史实：9月17日“晚上，梁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①吴法宪的回忆把时间、人物、地点和背景交代得很清楚，而且与王兰义的说法、邵一海的调查以及其它确凿的事实相吻合；此外，《周恩来年谱》上的相关记述，即“9月17日先后约见杨德中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忠等”^②，也可作为其旁证。

物证去哪儿了？

退N步讲，比如，吴德、吴忠后来都忘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查封据点这码事；又比如，周恩来不想打草惊蛇，所以没指示空军配合，而且让卫戍区部队化装或者秘密进入空军学院；还比如，周恩来当时只知道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黑据点，不知道东郊民巷等处的据点，所以只下令秘密查封了空军学院的黑据点……

但是，没抓到人，总该查到些物吧？物证去哪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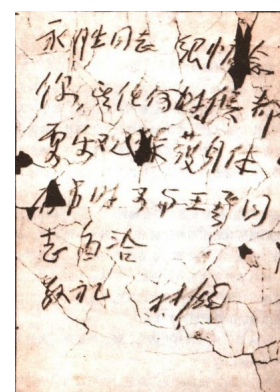
^①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873页。

^② 力平、马芷荪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483页。

毕竟，按照王媛媛的说法，周恩来给吴忠的命令中还有在黑据点中“搜集罪证”这一项，而且卫戍区部队奉命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黑据点“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

既然如此，为什么9月15日晚上王兰义等人还能在黑据点现场发现《“571工程”纪要》等物品呢？吴忠的手下真的会如此粗疏大意吗？

让我们看看吴忠本人的说法：周恩来要求迫降的飞机上的“片纸都不能丢掉”。①吴忠为了找全在迫降飞机现场发现的三个被撕碎的文件残片，除了要求部队在现场“像篦子一样找”之外，还让医生“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虽然最终“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②



看吴忠及其下属这个认真劲儿，如果他们真的第一时间到过空军学院的黑据点，怎么会遗漏后来被毛泽东视为所有罪证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③《“571工程”纪要》呢？吴忠又怎么会把查获《“571工程”纪要》的功劳拱手让给坐镇空军的李德生呢？何况，吴忠本人还对李德生9月13日的某些行为颇有微词呢。④

至于吴忠为什么没有在审问李伟信之后马上派人去搜查空军学院的黑据点，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⑤“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⑥而且知情的

①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23页。

②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24页。

③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429页。

④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24页。

⑤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24页。

⑥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55页。

三个人，即吴德、吴忠和杨俊生，当时还得忙于亲自整理从迫降飞机现场查获的录音带和碎纸片。

王媛媛的说法有依据吗？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 5 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还是“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 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都背离事实。

但是，有研究者指出：“说吴忠回忆不真实，倒不如说书写者王媛媛的记载出现重要失实更准确些。”^①“严格说，作为采访者，舒云应该向王树德追问：

‘迅雷不及掩耳’期间，吴忠到底查获到了‘571’没有？具体带队负责人（负责搜查空军学院的搜查分队）又是谁？搜查分队什么时间进入、什么时间撤出空军学院？谁下的命令？可是舒云并没有做这样的追问，她的所谓‘调查’是不到位、不扎实，也很不专业的。”^②

那么，被舒云们奉若神明的王媛媛说法有依据吗？

有！

根据笔者的“非完整调查”，王媛媛文章的全部内容均摘自曲爱国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出版的《吴忠少将》一书的第十八章——〈风云“九一三”〉。

比如，王文中的如下内容就一字不差地来自《吴忠少将》的有关章节：“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

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①三尺晴天：《评舒云对“吴忠说法”的断章取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c3c7cd0101e1nw.html

^②三尺晴天：《评史学〈“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再辨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c3c7cd0101e1pev.html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①

《吴忠少将》一书的一个更早版本，是同一家出版社于2000年4月出版的《百战将星——吴忠》，两书的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后一版的书中只是多了一些照片而已。此外，曲爱国本人曾经将《百战将星——吴忠》的第十八章——〈风云“九一三”〉摘发成一篇独立文章^②，该文中也有上面所列的周恩来的五条命令。^③

造假难免穿帮

那么，曲书的这部分内容又来自哪里呢？曲爱国采访过吴忠本人吗？

吴忠将军晚年生活并不顺遂，曾经受到长达8年的审查，并于1990年2月因车祸去世，所以他生前不可能接受1983年夏才穿上军装的曲爱国这样陌生的“小同志”的采访，否则，曲爱国的写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谬误。

难道该书的〈风云“九一三”〉一章，尤其是其中的周恩来的五条命令，是曲爱国凭空杜撰的吗？

那倒不是。笔者认为，曲爱国参考了吴德口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发表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一文。吴文中与周恩来9月13日凌晨指示相关的内容如下：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① 曲爱国：《吴忠少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374-375页。

^② 曲爱国：《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协商论坛，2001年2期，10-12页。

^③ 曲爱国：《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协商论坛，2001年2期，12页。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①

对比吴文的四条和曲文的五条可以看出：曲文中的一、二、四、五条由整理吴文中的一、二、三、四条而来，核心内容未变，但曲文中的第三条则是他塞进去的私货。

另外，曲爱国还参考了一篇吴忠当年部属为其辩诬文章中的内容，即：9月“13日当天，林彪一伙在北京的五处秘密据点被查封。吴忠到每个点上指导执行任务的卫戍区干部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被捉获的林彪死党李伟信是直升飞机上重要的活口，吴忠连夜对李进行审讯，李供出‘五七一工程纪要’。”^②但是，曲爱国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演义式扩充，加入了“扣押全部人员”，“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③等情节。

不过，造假难免穿帮。比如，曲文中的如下内容：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忠连夜审讯李伟信。”“吴忠听着李伟信的招供，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林彪反革命集团要谋害毛泽东，进行武装政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密谋已久，已经付诸行动，其爪牙、死党也遍布军队的要害部门。”稍后，“有件事情，引起了吴忠的注意。李伟信在供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情况时，曾提到他们制定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在清点机上缴获物品时，并没有发现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吴忠忽然记起李伟信在招供时，曾经提到过一组数字——‘571’，会不会这组数字与其武装政变计划有关？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李伟信招认，‘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计划’。经吴忠追问，李伟信又供

^①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54页。

^② 李英，维赛：《“吴忠有忠”——记“文革”中的首都卫戍司令吴忠将军》，《百年潮》，1998年5期，51页。

^③ 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78，383页。

称：‘571 工程计划’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 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①

除了第一句是事实之外，其余的全是曲爱国的演义。

实际上，即使完全不知道王兰义等人9月15日晚和16日晚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发现和转移《“571 工程”纪要》的事实经过，单从曲爱国演义的文本来看，就可洞悉其破绽：因为曲先是说，9月13日晨，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卫戍区部队查封了所有黑据点，而且“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接下来，曲又说，吴忠是在两次连夜提审李伟信之后，才搞清楚“571”的含义，再“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去空军学院的黑据点查获《“571 工程”纪要》。所以不难看出，“吴忠亲临现场”与“吴忠亲自带人”两者中必有一假。

东汉哲学家王充有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然而，美化传主是现今国内传记作者的通病。笔者认为，曲爱国在这里只不过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罢了。

不幸的是，曲爱国还把王媛媛带到沟里去了，王媛媛则把舒云们带到沟里去了……

2014年6月25日定稿

^① 《百战将星——吴忠》，381-383页；王媛媛：《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文史精华》，2006年4期，15-16页。

【北京文革】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四）

胡宗式

十九、市革委会对聂元梓的批判

从3月20日起，市革委会开始了对聂元梓的批判。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做了这样的叙述——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先制定一个革命化的条例。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我就在会上讲了，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不是只制定几项革命化的条例，而是结合从实际认真进行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我就把我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听到这话，谢富治气得手都直哆嗦。他没有想到，我会把火烧到他的头上。（第251—253页）

在《不祥的警报》一节中，聂谈到了对她的批判——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了，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代会成员）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成立以来的“功勋”。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大的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干涉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

让你骂；我也管不了。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什么决议，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啊！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的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刘福，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一天夜晚谢富治在卫戍区召集市有关领导人的会议，刘福也参加了，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溜出来，对他女儿刘新民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三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他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叮嘱王茂湘，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并没有紧张，但我要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对待。回想在这以前，把批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讯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

发生什么大事情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定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讲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大家都了解到底市革委会都批判我是些什么问题。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让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的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子交给了大家。（第255—263页）

在《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一节中，她又做了补充说明——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三·二五”大武斗事件。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市革委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谁还手谁负责任。等我回去以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是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台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

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能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

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在市红代会值班的陈良赶来，同我一起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我看到人多得很，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涌进校门。

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看今天市革委会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们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他们到北大来搞武斗，北大的学生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上边的黑手。为了千万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皮，拉这个挑动武斗的黑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下面是聂在《谢富治：“你真厉害！”》一节中的陈述——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我问他们，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

他们说，他马上回来。我就坐下来等谢富治。我感到愤怒得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挤满了，进都进不去。我说，“今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次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人。在我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也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做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我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我眼前。一分一秒都是极为重要的！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策划武斗，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如果两边的学生真的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纪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要流血。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的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打倒了，任何证据都无法证明我无罪。那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我抓到监狱里，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谢富治说他不去。他不去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

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这样，我就逼着他来北大了。吴德、丁国钰也跟着来了。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搞什么名堂。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嘿！聂元梓，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我又说：“谢副总理，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几万人的大武斗，处在千钧一发，我的心又急又愤怒，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打不倒。”我说，“我不怕打倒，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没有别的意图，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了一句，“你真厉害！”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进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己的学校去。北大的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他这么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啦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七个学校的学生，万人以上，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显然是有组织有领导统一指挥的行动，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不批评，不追查，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装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

皮子底下发生这么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竟然都不吭声。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批判谭厚兰的会，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集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了一次会，指示不准批谭厚兰。谁批谭厚兰就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谋，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来北大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批判谭厚兰是她们学校的人和蒯大富他们搞的。

3月25日那天我在高校学习班，对学校的情况没有感性认识。过后我在颐和园外（铜牛出口）的一户院墙上看到一幅标语“打倒聂元梓！北京卫戍区”，给我的印象很深，不在于打倒聂元梓，而在于它的落款。一般军事机关写大标语或大字报，落款都是群众组织，如高等军事学院“红联”，军事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没有只写军事机关名称的，直书北京卫戍区仅此而已。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二十、杨余傅事件

1968年3月24日，突然由林彪出面，宣布杨、余、傅是反党集团。说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杨、余、傅是王、关、戚的后台。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中央首长对社会讲述杨、余、傅事件。聂元梓带领20人参加大会，我一同去了。下面引用部分讲话。

江青： ……现在要和同志们讲一讲二月逆流的问题。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因为这个斗争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广

大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就蒙蔽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颠倒黑白，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打倒谭震林！）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不对！）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王、关、戚！）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打倒刘邓黑爪牙王关戚！毛主席万岁！）。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我们，要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否定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功勋，来否定中央文革。（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角色，势必蒙蔽欺骗一部分群众。这样我们对他们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采取分割政策，王关分割不开，戚本禹作法不同，因此分割开来一个时期。但是分割出来不等于说他没有问题。果然到去年下半年他更猖狂起来了，（打倒戚本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内部在原则问题上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去年十一月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不指名的批评戚本禹。他勾结着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倒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而且这些坏蛋都是中央文革端出来的。（伯达：主要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我认为不应该归功于哪一个人，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革命群众，归功于伟大的解放军。

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众：反革命！）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

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史上总是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目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左”倾机会主义。

康生：特别是江青同志先将王、关，后将戚本禹的问题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巨大功绩。（口号）在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要坚决地保卫北京市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亲自批准成立的，是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关怀指导下，同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等斗争胜利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是新生的事物，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它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也混进了少数的坏人，像傅崇碧、周景芳等等的渣滓，对这些坏人我们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斗争，当然要批判。但是，不能动摇我们这个红色政权。

陈伯达：现在大概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口号）

二月逆流是彻底的破产了，（口号）彻底失败了！有一些极少数人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妄想！这是第三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他挖出来了，把他们挂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周恩来：他们在搞阴谋的时候，他们起了一点儿作用，就是想搞垮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像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他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所以这一种阴谋一旦戳穿以后，使我们眼睛更亮了，阴谋就更容易被戳穿了，两面派更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多的教训，希望我们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这一课。在去年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系列进行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当中，在去年夏秋间极“左”思潮形成的“五·一六”呀，“揪军内一小撮”呀，这些活动当中，在今年的极右错误，极“左”的思潮又转向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的活动，杨成武这个事情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进程中说来它不过是一个曲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但是，这个逆流都在我们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揭露下，在我们中央文革的严厉的批

判下，批倒了，批臭了，批垮了！我们懂得在一切革命运动中道路总是曲折的，总会出一点小小的逆流，这正是因为我们在胜利的前进中，鼓舞了我们。我们要遇到一点困难曲折，来考验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这种小小逆流我们作为反面教材来锻炼我们，考验我们。因此正如刚才陈伯达同志所说的，就在这样一个战斗当中，我们在夺取全面胜利当中，已经揪出这一小撮的人来了吗！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应该庆贺这个胜利，我们要打倒被我们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我们要打倒彭德怀、贺龙，要打倒彭、罗、陆、杨，要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要打倒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打倒小爬虫王、关、戚，因为王、关、戚确实是刘、邓主持工作时候，他们决定参加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他们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出来，这就是他们表示出最无私的，最原则性的丰功伟绩。（总理带头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江青同志：向革命群众学习！向解放军指战员学习！）所以我们正如同我们大家所说的，我们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向我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致敬！向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红卫兵致敬！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广大的革命群众致敬！

这次大会传达了几个信号：

1. 杨余傅是反党集团；
2. 二月逆流问题重要，不能为二月逆流翻案；
3. 王关戚是极左的，是江青端出来的；
4. 谢富治是不能反对的；
5. 聂元梓要一批二保。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

一批二保的提法，按当时的理解，首先是批。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总理和其他首长讲到余秋里陈毅李先念等时多次使用“一批二保”，“你们不要一批就打倒，一保就不能批”。聂元梓对此也敏感，从3.27大会会场回来，多次问我总理是怎么讲的，语气怎样。

江青讲哈斯到北大的问题：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

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张万来的文章，二是聂元梓回忆录及我对此事的记忆。兹引如下——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1979年3月15日

记者 张万来

……在上一个预谋的圈套正在演用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三月八日晚上，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去要材料的同时，聂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她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三月十一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与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她还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谎言。明明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明明是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商量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这样，傅崇碧同志就

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聂元梓回忆录》对这件事的叙述：

一九六八的春天，大约二三月间，在北大，我找了魏杞文谈我的观点，又找赵建文几个人，布置写一个报告：“对派性也要进行分析”，是写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报告由魏杞文起草，经我修改以后用两个不存在的战斗队的名义发出去的。

为什么写这个报告？就是因为江青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煽动派性，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斗争；但是，他们又以批判派性的藉口整我们。在他们控制的舆论中，把我们和王、关、戚的斗争，反对他们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以便安排他们的势力掌权，并且挑动武斗，也说成了派性。我的意思是要分辨这种情况，我们和“地派”的斗争，也是和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斗争。我们不是反对“地派”中的学生群众。“地派”中的有些人是受中央文革指使的，他们搞派性，是在替中央文革排除异己。因此，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表面上看是两派在闹，实际上是有中央文革在操纵，我们是在与中央文革那帮人作斗争。总之，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央文革分裂群众而写的。这个报告没有用个人的名义，用的是两个并不存在的战斗队的名义（是我们编的一个叫“独立寒秋”，另一个叫“傲霜雪”），这是为了自我保护，要是我自己出面，那被江青他们追究起来，又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了。我就假装是学生们交给我的，要是追查起来，就说那两个战斗队已经解散，那些学生也找不着了。北大上万名学生，我到哪里去找？

这篇报告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这篇报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

北京卫戍区的干部哈斯为这件事情到学校来，我正好在外边开会。哈斯找到一个学生，也姓聂，名字记不清了（这份报告是经这位姓聂的学生的手印刷的）。和哈斯一接触，聂很紧张，不知道是吉是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不好了，家里出了事了”。我问他，“出出什么事了？”他说，“卫戍区来了人，叫哈斯，他们逼我把报告的底稿找出来，交给他。我说这底稿一时半会找不见，他们就让我下午一定找好了给他。还问报告都交给谁了，要名单。”这个学生不知道问题何在，以为要倒霉，就跑掉了。他跑到颐和园躲了起来，不敢回学校去。这件事有误会。哈斯是卫戍区派去的，那时军人本来就威风，哈斯又说得很严肃，好像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就把姓聂的学生给吓坏了。我心里有底，我自己的动机我自己清楚，这个报告我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个报告打上去以后发生什么情况，我就知道了。这个报告本来是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怎么会是卫戍区来人追这件事呢？我也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告诉这个姓聂的学生说，“你不要怕，不要躲，不会有什么事的，有事也找不到你头上。你就告诉他们说报告交到上边了。底稿不要交，就说找不着。”

接着，我也想摸一摸中央文革情况，看看这个报告有什么反映，我就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说是有紧急的事情，要求江青接见。江青接见我，我就讲了这件事情：本来是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现在卫戍区来人查，把学生给吓跑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江青告诉我，是谢富治派卫戍区的人去要报告，谢富治听说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报告，他想看看这份报告，江青也想看看这份报告，所以派卫戍区去要。我就说，你江青、谢富治要看这个报告，打电话给我就行了，派了卫戍区的人去直接找学生，哈斯又那么威风，学生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还不吓坏了？

对于这件事，我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

1967年3月7日中央开会，江青需要北大“傲霜雪”和“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上报的材料，叫谢副总理派人到北大要一份。谢吩咐给傅崇碧，傅派他的部下哈斯到北大来要材料，以卫戍区的名义要。聂××说：“这材料都已上报。”哈斯要底稿，聂××说：“底稿也没有了。”（不给的原因是我们和卫戍区没有这

种关系，对他们有看法。) 哈斯说：“谢副总理要这材料，你们给不给？”“我们当然给”。哈斯无礼地问我们把这材料都上报给哪些首长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 要我们开列名单，竟狂妄地说：“毛主席的名单我也要”，并拿走了带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2) 哈斯问这份材料都上报给谁了？聂××写了一份名单，放在桌子上，没有说给他，是哈斯自己拿走的。两个版本的共同点是：哈斯拿走带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这就犯规了。聂元梓当即打电话给江青，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江青于3月8日凌晨接见了聂元梓（在钓鱼台，当时还有陈伯达）。

粉碎“四人帮”以后，哈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述说“四人帮”对他的迫害，主要内容是到北大要材料的事。文章也不提他要毛主席的名单。

对比江青在3月27日的讲话和聂元梓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话，前后有不同的解释。3月8日接见聂元梓时，江青几次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刘少奇嘛！”这是鼓励聂元梓在学习班兴风作浪。在十万人大会上江青说：“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这是指责聂元梓：谁让你闹的。

二十一、7·27 工、军宣队进入高校，两大派的历史结束

1967年9月王、关倒台以后，在形势上天派占了上风。1968年3月27日的大会又强调了反“二月逆流”的重要性，不能为“二月逆流”翻案，并且谢富治是不能反对的，这对“地派”有利。表面上两派的争斗取得了平衡，而实际上激化了两派的斗争。

清华、北大、师大等一些院校发生武斗。武斗的导火索和过程各有不同，从人们的内心都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分歧即是路线，而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也许这是武斗的思想根源。如果我们有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不会同学之间刀兵相见，残害无辜。武斗的局面越来越不能控制，毛主席派

3万工人，进入清华大学，以血的代价制止两派的武斗。以1967年7月27日为标志，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北京的两派斗争也随之结束。

7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涉及内容广泛（详见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兹将讲话中关于制止武斗和结束斗争的内容摘引如下——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注：北大井冈山兵团）、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的，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毛泽东：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这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

结束语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北京乃至全国两派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挨整了。我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两年又两个月，结论是：跟着聂元梓犯了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比起那些因审查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我是幸运的。在审查期间我亲历了政治的无耻。

1967年我对陈伯达的“6.5”讲话不满，动态报里“红暴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对陈伯达什么态度！”1970年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陈伯达是清查小组组长，这时如果对陈伯达不满就是罪过，但庐山会议后又把陈伯达说成聂元梓的后台，当然也成了我的后台。

1967年反王力、关锋，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罪过。到了1971年专案组说：“你们反王关戚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还是罪过。

1967—1968年反击“二月逆流”时，有“打倒派”和“炮轰派”之分。“炮轰派”认为几位副总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总理。说“炮轰派”是“二月逆流”派。到了1971年，专案组说：“不论炮轰还是打倒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9.13事件”前，专案组说我反对林副主席（我曾和聂元梓到军艺星火燎原去及我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我没有这个感觉”，这两件事无限上纲），一再表明他们对林副主席是多么热爱，有了林副主席做接班人他们是多么幸福，你胡宗式对林副主席是多么恨。“9.13事件”后立刻变脸了，对我说：“这下你们的后台更清楚了。”

当时把反谢富治列为重大的五·一六罪行，为了把谢富治和“1.15事件”剥离，就不能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专案组和我有这样一段对话：“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毛主席语录上有这么一条吗？”我说：“没有。”专案组：“那你怎么相信呢！”

中国共产党党史谈抓“五·一六”（党史第二卷下册第816页）：1970年1月和2月，党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正式宣布完成。这场持续多年的清查活

动，有极大的任意性，被指为“五·一六”分子及其后台的人不断变换和增添，并株连大批亲属。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从 2008 年版的《北京大学纪事》和后来某些人的文章可以看出，北大的一些人时至今日还沉迷在清查“五·一六”的氛围中，不是太可悲了吗？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
- (2)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 (3) “毛主席的新北大”，新北大公社“火车头”战斗队编纂的中央首长论北大（1966 年 6 月至 1967 年 10 月）。
- (4) 卜伟华的博客，卜伟华先生是党史研究者。
- (5) 北大“动态报”。
- (6) 北京市委的资料库《宣讲家》。
- (7) 谭厚兰 1967 年 11 月 15 日在师大讲用会上的检查（油印资料）。全文见胡宗式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zsh](http://blog.sina.com.cn/huzsh)。
- (8) “回忆和总结”，清查《五·一六》时对我的审查结束后，回到家中凭记忆所写的参加文革及受审查的情况。

【述 往】

风风雨雨话当年

——师大女附中的“反动学生”

罗 治

原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我出生在郑州，上小学时来到北京，1961年考入师大女附中初中。

一进学校我就听说，某某同学在暑假刚刚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北戴河疗养，某某同学寒假还要到广州从化温泉玩呢。而我，除了家门就是校门，哪儿也没去过。又听说谁谁曾给毛主席、西哈努克献过花，谁谁就是招贴画“我们爱和平”中的小女孩原型。我自认为唱歌还不错，可是班里不少同学



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建国十周年（我们班1965年“五一”北海公园跳竹竿舞）演出，我除了在妈妈学校扮演过出场两分钟的小女孩外，什么也没参加过。

同学们说着天南海北的时候，我经常是大眼瞪小眼，只有听的份儿。因为我家住石景山，离学校太远，所以我申请住校。住了校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同学是这样生活的：夏天盖的是毛巾被，春秋是夹被，冬天是厚被子加毛毯。而我由于家庭困难，学校批准我和也上女附中高二年级的姐姐住在一起，两人只有一床被子——晚上我们睡通腿。妈妈对此很感谢学校的安排。那时我还没有感觉到所谓“贵族女校”对我们的歧视，只是觉得自己跟同学们一比，怎么那么寒酸？我

自打上了女附中后就倍感压抑，我在小学时的优越感在这里荡然无存，不仅胳膊上戴的大队长符号没了，见识短、条件差、生活窘迫的感觉无时不压在心头。

慢慢的，我终于悟到，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不少同学生活那么优越，因为她们的爸爸妈妈在政府部门或军队当干部，她们的出身叫“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而我在班里从来不愿提及我的爸爸。我爸爸在1955年“肃反”中，因受同乡国民党特务头子的牵连入狱，后来在狱中复发严重的精神病，半年后保外就医。

我从哥哥姐姐传给我的要交给组织的材料中得知，他的病根是在1941年国民党抓捕疑为共产党员的爸爸时（实际上这时他已脱党，河南省的党组织认为他在党外更便于为党工作），党组织命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只身一人在黑暗的红薯窖中躲藏数日落下的顽疾。但我也知道爸爸虽然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后来脱党，之后为了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发生了联系……总之，爸爸的历史复杂，因此我的出身算“杀关管”人员，当然比“黑五类”还坏。爸爸从监狱出来后，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光顾我家，他们看我爸爸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从小见了警察就害怕。

1960年我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我肚子老饿，爸爸到周围农田捡些挖剩下的红薯尾子和菜叶什么的给我们吃。妈妈总和爸爸争吵，但我爱爸爸。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觉得爸爸是坏人。他就把我当作知己，经常拉着我的手说，“二几年”在家乡安徽省金寨县的什么山头开了什么会；“三几年”在河南南阳搞乡村教育，那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全中国都很有名；“四几年”通过当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同乡救了共产党的谁谁，如今他们在哪儿当书记、省长。我哥哥听了经常反驳爸爸，但我从不回嘴，因为我不懂得那些事，只知道爸爸说了也改变不了他的身份，改变不了我们家的境况。

就在1960年的国庆节，爸爸有好几天没有回家，后来我听妈妈说爸爸死了，是在旁边的永定河里发现的。妈妈说我太小不懂事，没让我到河边去看爸爸最后一眼，晚上我想起爸爸就在被窝里偷偷流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初中时我很单纯，糊里糊涂的，只是觉得功课好品行好，就是好学生，对出身好但学习不好为人不好的人还看不上呢！我的二姐四哥五姐（我家是大排行）功课好，他们分别在1957年、1962年和196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三哥功课也特别好，还是学生会主席，1960年却只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听说虽然他考得很好，但那年特别讲“阶级路线”，他因此无缘进入北大。

1964年我又考上女附中高中后，明显感觉空气变了。一开学学校就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学习，包括学习毛主席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号召同学们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深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根源，要求人人都要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自己的认识等等。学校再三的启发诱导，并指出这是关系到对党是不是忠诚老实的问题，是不是决心跟党走的问题。

那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思想纯洁又简单，不知道怎么说好，但是为了响应号召——一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就拼命的搜肠刮肚，给自己上纲上线。记得有好几个同学说：自己有利己思想，只想好好学习将来当居里夫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集体，这样走下去，势必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中，滑到革命的反面，就是反革命。

我记得当时团员纷纷找非团员谈话，要求明确自己对家庭的认识。每到这时我都特别怵头，但我也要表现进步的样子，说我爸爸革命不坚定，一到紧要关头就叛变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可耻的叛徒。其实我根本不清楚我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这样，就是对家庭没有认识，就是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就总也过不了关。

那时人们在填表格或写材料时都极其忠诚老实，自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我也明白，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入团。我思想汇报写的少，靠拢团组织不积极，我还在暴露思想时说：自己觉得不入党不入团一样干革命，鲁迅也没入党入团，毛主席不是一样称赞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将！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对毛主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我刚刚看了萧三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书中写到：毛泽东的文科好，作文好，但

数学不好。我就想，毛主席也不像宣传的那样神，也不是什么都好，数学就不好，我还有点“显摆”自己看书多似的跟班里同学说了。实际上，此时同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明显了，划分的标准就是家庭出身。

记得好几次下午下课后，教室里立刻少了一部分人，一观察，走的都是干部子弟。听说学校专门给她们开会，开展“誓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教育。出身好但有明显缺点一直没有入团的同学也相继入团了，她们在班里的表现逐渐张扬起来，地位也在无形中上升，班里传出的舆论是说她们的阶级感情如何如何深。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越来越大，这些人明显地都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觉得越来越不被信任，越来越被边缘化。我清楚自己，入团无望，不过，我有点不识时务，心中的不快也越积越厚，有时跟团员“交心”时还说：“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为什么我们就选择不了？”

估计就是这些向“组织”暴露的“活思想”，文革中给我带来了大麻烦。

我们班的夺权斗争

1963年下半年，刚从北师大毕业的王本中老师开始教我们班数学，生动活泼的教学，总能引发我们的兴趣和思考。教我们语文的刘超尘老师、教几何的储瑞年老师，个个都是教学有方的年轻才俊。我们有幸于这样的“强强联手”，1964年中考时我们班有24人又考上了师大女附中高中，别的班考上本校的不超过10人。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佳绩，王本中老师继续担任我们高一、高二的班主任，为此我和一些同学特别庆幸自己上了好学校，又遇到了好老师。

这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各种“批判”也开始了，班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1965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高二年级有四个班，那三个班的班主任和学生班长都是好出身，老师出身贫下中农，学生班长都是干部子弟，只有我们高二二班班主任和学生班长不是这样。当时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波及到城市以及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阶级斗争的弦拉得更紧了。记得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在学期中间酝酿改选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

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错误的阶级路线造成的，因此她们要求进行班干部改选。

我们班主任的想法是，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也不是什么“黑五类”，她父亲就是个开了小铁匠铺的小业主，况且她的哥哥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现在也是革命干部，她家算不上什么“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大部分已经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真的要改选班干部，也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在每学期的开始进行，学期中间没有特殊情况怎么能改选呢？我们班主任老师还专门去请示了学校教导主任。主任说，还是再做做要求改选的工作吧——他们都没有同意改选班长的要求。

班里为此开了会，干部子弟质问班主任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班主任说他努力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都符合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班主任老师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老师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我还记得老师那时在我们班做检讨，说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我当时不大明白，老师怎么就叫“摔倒了”？他那么钻研业务，书教得那么好，成绩是明摆着的，大多数同学都欢迎他教我们，为什么“红五类”非要换掉他？再说了，我们下乡劳动时他还奋不顾身挡住塌下的土方救同学呢，因为出身不好就要遭受这样严重的惩罚？！那出身不好的人今后还怎么活？我虽这么想，但也不敢说，我不是也是出身不好吗？说出来，不是公然对抗“红五类”吗！这个紧箍我是时时戴着呢！

我们班的大字报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开始了。随着社会上的动荡，女附中的课也上不下去了。1966年6月2日，高三年级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各种批判校领导和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会儿说卞仲耘校长是假党员，参与前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一会儿说胡志涛校长迫害干部子弟——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就差两分女附中硬是不收，

一会儿还勒令特级教师、人大代表王明夏老师交出非法所得（就是工资）。“红五类”们耀武扬威、精神抖擞，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自然没有革命的权力，我既不敢往前凑，又不敢往后撤，每天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1966年6月18日中午，我们班的干部子弟突然在黑板上贴出了大字报——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及其爪牙×××；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罗治；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一贯与组织对抗对党不满的小市侩××；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蹿下跳，企图浑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的队伍。警告你们，混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毛主席的共青团员 66.6.18

随着大字报一张张地贴出，我的心在一点点收缩，脑子完全空白了，时间好像凝固了。想必同学们最初看到时也都傻了。我班孙行玲同学在她的博客中回忆大字报刚贴出的这一时刻：“我当时不在场，因为我家离学校特别近，所以全班只有我中午能够回家吃饭。那天饭后我一推开教室门，就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射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午休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坐在位子上，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表情怪异？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坐在位子上，前边还站着几位，一脸严肃，这时我更觉得气氛异常、紧张。不等我坐下，就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对这张大字报什么看法？我这才发现黑板上贴了满满的大字报，我看了内容，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心脏一下抽紧了，哪里还会思考。但在追问下又不能不说，我下意识地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说完我立刻感到后悔。因为我马上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有人说我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把我吓哭了，心想别人不发言，我干嘛让说就说，自找倒霉。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第一个站起来反驳我，说出身决定思想，出身决定立场，你同

情她们说明你的思想和她们一样。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而说这话的人自己出身资本家，我当时气得想反问‘你哪？’但在大家七嘴八舌地反驳、批判下没有我再说话的机会了。过后我们班领导小组在同学中划定‘左中右’，我是‘中右’，这还是经过激烈争论，考虑到我一贯表现和当时直话直说了。而那位是‘中’，让我心中颇为不平，不就是批我有功吗？打击别人，保全自己。现在我可以原谅她，人在恐惧时自保也是下意识。也或我把她想坏了，可能人家就是响应革命号召，积极要求进步。”^①

文革后同班同学聚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这张大字报，当年被点名的同学诉说着那时的不解、惊恐、压力、愤懑，我没想到几个未被点名的非红五类同学说自己更是害怕，担忧，不知道下一刻是否就会点到自己头上，不知道自己又会有什么罪名。在大字报中，我很“荣幸”地成为“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大字报点了班里12个同学的名字，全班共有43名同学，近30%的人被认定是“坏人、反革命”。

当时，我们这些被点名的学生没人敢理睬，我们彼此也不敢说话。我整天低着头学毛选看报纸，或抄写领导人和工作组的讲话，所以今天留下了那本有文革记忆的“罗治笔记”。宿舍里几个同屋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我一回到宿舍就更抬不起头了，害怕、恐惧、压抑、不服等各种情绪纠结在心里。终于，6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住的宿舍门口贴上了一张大纸条，上面赫然写着“资产阶级狗崽子不许进！”我的被褥被扔到楼道里，显然这是把我“驱逐出境”了！我真想冲进去质问她们“凭什么”！但转念一想，我这样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干脆我不回宿舍了，反正学校也乱了。自此以后，我就整天到北大、北师大看大字报，找大学生请教。我在外面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反革命，大学生们也没认为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觉得这个中学生还挺会动脑筋想问题。我感到了精神的解放。

选准打击对象

我们班一个被大字报点名的同学压力很大，她原来是个出色的好学生、好干部，现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反差太大，她特别受不了！据她2008年跟我说，

^① 摘自孙行玲新浪博客《我们班的大字报》（2011-09-27）

6月18日贴大字报当晚，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又把她带到学校礼堂去批斗到深夜，此后连续七天七夜没有回家，白天打扫厕所，接受问询批斗，晚上和衣睡在礼堂的长条木凳上。班里其他同学最近还告诉我，这位同学后来回家时又带着红五类同学抄了自己的家；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又怕红五类说自己没有资格戴毛主席像章，就把老人家的像章别在自己胸前的肉上……当她和我说起文革时撕心裂肺的样子，我至今难忘。其实她的出身就是小业主，她在大字报上的全部“罪名”仅仅就是“校领导的大红人”，但学习好、威信高，音体美俱佳，又是班长，干部子弟可能有嫉妒的成分，更多的是认为班里大权旁落，“气不忿儿”了。以后她每听到谁买了房子成为“业主”，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发自内心的厌恶“业主”这个词。

后来我和这位同学结合邓榕（原师大女附中高一一班学生）1967年4月5日给她爸爸贴在学校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中所写的内容，试图分析我们班红五类为什么要点这12个人的名。^①邓榕在大字报中写道：“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指少先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

我们分析，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全校各班都贯彻了邓小平对学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的指示。我们班的大字报就相当于我们班的黑名单。为什么点这十二个人？一是受反动血统论的毒害，这些人家庭出身基本是黑五类或灰五类（即父母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一般职员等）；二是有几个人就是班里的“右派”，有言论，比如我；或者还有几个人对待干部子弟不那么“巴结”，被认为是仇恨干部子弟；三是其中还有几个共青团员或团小组长。刚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点这几个人，她们其实是班里的好学生，为什么

^① 摘自《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网上有报道说经过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和我们这几个“另类”搞到了一起？后来经点拨才明白，她们错就错在不是红五类出身，还入了团或当上了团小组长，这不就意味着你不仅钻进了革命队伍，居然还掌点小权，这不正说明班里红五类还没都当上干部吗！大权旁落了呢！所以必须把这几人搞臭，然后夺权让你下台。联想到1965年我们班因为班长不是红五类就要罢免班主任和改选班长，可见红五类要接革命的班就要夺权掌权的教育，是多么深入人心！

后 话

经过了这样一番“斗争历练”，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我没和同学们一起去山西、陕西，也没到内蒙、云南，而是在学校和家属委员会的一再催促下，于1969年3月独自一人回到了我的老家——安徽省金寨县插队，妈妈和哥哥姐姐



们觉得那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父亲曾参与了它的创建，也许乡亲们不会觉得我是“狗崽子”而排斥我……

文革结束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回想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八年生活，我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我

（1982.9.7女附中我的初中班部分同学合影）非常感谢母校，感谢老师。女附中真是不同寻常，女附中的老师，女附中的同学真的也与众不同，我在这里开阔了眼界，养成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习惯。

我在刚一入学时，学校尚无歧视我们姐妹的意思，只是后来的形势变化，阶级越来越分明，压力越来越增大。但是这个账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我不会算在我的老师们身上，他们受的害比我大得多，我们谁不是受害者呢？就是我的同学，包括斗过我的同学，其实她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班好几位红五类同学的父母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前就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她们自己在1966年后也有居无定所的时

候。我如今和她们的关系一般，不亲也不近，其中有几个整人的同学在 1967 年军训时曾给我道过歉。没有道歉的同学，我也不会去追究。

良心发现和人性回归，首先是对自己的精神解脱和升华。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向谁讨债，不是追究谁是谁非，而是直面历史的独立思考，是全民参与的真诚反思。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知晓标准答案，而是寻找和实现标准答案的过程。当你拥有了独立的思想、正义和良知，你就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起码的独立和尊严，维护人性和道德底线。

【述 往】

安希孟回忆录(一)

——少年时代

安希孟

孩提时代听人说过战争故事。抗战时代，驻扎在绛县磨盘山的国军陈子文部，经常来南常村。南常村的秦孔思老师是远近闻名的儒生，知识分子。陈子文对秦孔思执弟子礼甚恭，必去拜访。孔思先生也迎迓礼送，在门口揖别。小时没听说陈子文部烧杀掳掠，还挺纳闷，以为国民党顽固派岂能不奸淫掳掠。年届古稀，忽然风气丕变，从大量宣传知道国军抗日的功劳，是大大的。小时候村民叫国军为“顽固”，盖因为毛泽东如是称呼故也。现在知道，国军抗日有功。

土改那阵把人拉出村外用石头砸死，狂欢暴民眼里闪出激动欣快的光芒。有人喊“打死他”，那就是法院终审“判决”。把人拴绑在铁轮车后拽拉，脑浆崩裂至死。大集体时，河南我的岳父虽是贫农，但却时常夸赞地富东家的好处和慈祥，他倒是常说生产队长如何欺男霸女。

说到阶级斗争，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南常村未能摆脱时代共性通病和局限。土改时听说吊打地主，致使其大小便失禁。把人活埋，这是幼年所听说的骇人酷刑之一。让牲口马车拽拉车裂，是祖上遗传，有点来俊臣式风味。那个时候斗地主可不像现在“斗地主”好玩。把人拉出去打死，是无需有证据的。

幼年仍生活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文明中，商品货币不发达。货郎担是搞活经济流通的中介。农民用鸡蛋韭菜换取针头线脑。五十年代中期才有了供销合作社。衣服上的线扣绊，不是西式纽扣。偏襟衣，打叠的大裤裆裤子。圆口布鞋不分左右，也不是高跟——高跟鞋保护大脑，也使人挺拔玉立。穿护肚的兜子。我脖颈上戴的项圈是银锁，为的是锁命。我小时候身体羸弱，妈妈让我佩戴长命锁。俗信戴锁可以保佑幼儿无灾无疾。其上文字多为“长命富贵”。图案为麒麟、龙、虎等吉祥物。后来知晓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自己脖颈上的锁链，便不复佩戴。没有空调，冬天暖手暖被子的是锡制暖壶。扁圆体，上面有一个可以拧开的盖子，可以放水直接在炉上加热。有时还给暖壶做个布套，晚上脚蹬着不会烫，延长保温

时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有自行车（俗称洋马）的人凤毛麟角。有一次，父亲的好友任登殿（他当时很时髦，戴瓜皮帽，穿长衫，有干部身份）骑自行车过来，在幼小的我们眼中，就是风驰电掣了。我的胖弟弟德怀慌忙横穿土路跌倒，反应极灵敏的堂弟希曾大声疾呼：“压人了！”任叔下车省视，见没事，安慰两句，遂走人。

我自幼体弱力薄，坐炕上辄老实呆着。我消化不好，记得在闫家巷外祖母家小厦，母亲用废旧书纸浸泡包裹鸡蛋埋置草木火灰中焖熟喂食我。这也许是当时奇妙偏方。我幼时很长时间仍把“吃饭”说成“次饭”，翼城土话俗称“咬舌头”。有一天忽然大彻大悟会说“吃饭”，连自己也大喜过望。我少时经常高烧妄言谵(zhan)语，可能神经受损，丢三落四，健忘不敏。发烧时，爸爸从大队部回来，声声唤：“玉槐，喝水。”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会烧坏神经。感冒，平热散是常用药。因食物结构大概蔬菜少，幼年便秘是常事。吃柿子尤其如此。当然，小时候揩屁股没有卫生纸，使用棉花叶、土坷垃、碎石断砖，偶然用棉花叶子，玉米叶子，会刺伤肛门。再就是小孩头上常长癞疮，不知何故。今乃不复常见矣。我和外省友人谈及此事，大家仿佛都知道那时候体质不如现在。言说这些，是因为那个时代生活粗放。

儿童时代恶作剧，我有时欺负哥哥，往他碗里撒土。兄希孔仁厚，辄忍气吞声。偶然一次占肉腥打牙祭，哥哥总是把梢子肉脔留在最后。我则全速饕餮净尽。我和哥哥吵架，父母总偏向我。那时候我在心理上常把茄子当白肉条吃——可怜的娃娃。经常吃长毛的馍馍（霉变）。剩饭发酸舍不得倒掉（大锅饭以后不再有剩饭），加热再吃。身上长虱子跳蚤。冬天十冬腊月围坐火炉。不洗头、不洗脖子、不洗手腕。耳垂冻裂，手背是厚厚的黑“垢痂”，等等。流鼻涕的时候，爸爸说，“把挂面吃了”，于是就“吸喽”一声。那时没见过挂面，后来见了挂面，无论如何不会和鼻涕联系在一起。倒是和北京师大附近农民晾晒的宽粉条相似。这就是我童年的形象。

记得冬雪盈尺，封门闭户，小姨和妈妈融雪煮饭。估计此时父亲已寄身军旅。大约在南院窑洞，50年代初，屋内地势坑凹。一日暴雨倾盆，雨水倾泻流入门槛，母亲和小姨妈手足无措，只能用炉灰填挡，无济于事。时父亲已在程公村乡

公廨上班。此后父亲辞归故里。父在乡公所负责救济粮发放，每年暮春时节，青黄不接，晨光熹微，窗棂微亮，我尚在梦乡，困难农民一早在窗外告哀乞怜请求救济。父亲隔窗耐心听取，温言软语答复。五十年代反封建，离婚率也高。

一九五四年，我家盖建北厦，我休学半年。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能够盖建新房，在当地绝无仅有。新房盖起后，我家院中杏桃繁盛，果蓂丰稔，韭菜成畦，瓜茄垂蔓，石榴花椒，山楂菜蔬，目不暇接。一大家子人，嗷嗷待哺，又没有货币，父亲勤劳，在院里种茄子韭菜。石榴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伯叔另择地基开凿窑洞五眼。在当时也是率先富起来。如果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倡三马一犁一车新富农经济，我们会生活得更好。

有一年，县里来了苏联马戏团，那时候中苏友好，我家里新春对联，爸爸就紧跟革命形势，门楣横幅写“中苏友好万岁”（后来的结局大家知道：两国论战，珍宝岛打仗，反霸，然后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崩溃，国人开始流泪，接着就是亲如一家）。舅舅在县城三完小工作，我们在父亲带领下，徒步远足二十余里观看。第一次吃元宵和牛肉丸子，不小心烫嘴。父亲特意为母亲买了几个生元宵回来，但不知如何煮熟，破了不少。妈妈在家忙于家务，未能抽身观赏马戏。她所能欣赏的唯一节目就是“村社杂戏”。她做衣服时，常常哼几句旧戏曲。

有一次舅舅带我到七沟走亲戚。我逮住一本破旧的民间故事，如饥似渴。几个小时读完，其中的故事情节，后来在大学课堂上都作为生活哲理绘声绘色讲授给学生。读过舅舅的书《詹天佑》《皖南事变》，不认得詹、皖。舅舅那里有很多那个时代的革命书籍，我们尽情享用，也不归还。苦菜花，就是我们的革命营养。

小时候，农村孩子经常长头疮，有些竟然至于秃头。不卫生故也。我身上也曾经长疮流脓，乡村医生用膏药治愈！那时的卫生条件可以想象。我的左乳头至今偶有痛感，就是疥疮后遗症。眼睛不注意卫生，经常流眼屎，俗语曰痴头，眼疾，能糊住视力。病夫也。我有一次淘气，上柿子树摔落骨折，许鸿儒伯伯家老太太几次捏拿，顷治愈。我的筋骨不强壮，跌打损伤，时有发生，许家奶奶就几次为我推拿捏揉。说到长疮，一说青杏有毒。花褪残红青杏小。我家院子一株杏树，青杏，吃一口，本能地眨眼睛，酸涩。杏仁可以即食——但我现如今断定它有毒。农村孩子呀，上房揭瓦爬树跳墙，不奇怪。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全民写诗，浮夸吹牛，语言膨胀，直白无遮，一览无

余；修辞学上的含蓄委婉不见了。比如外交用语之“希望正视”、“敦促贵国政府三思”就很得体达意，不必说对方“混账至极”“反动透顶”“气焰极为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砸烂狗头”。直白，一览无余，泄恨解气，痛快酣畅，走到极端，再无回旋余地。“公社高粱长得大，长到天宫织女家。织女探头窗外望，撞了一头高粱花”。夸张之修辞格，运用不当，就肚皮泄气。新民歌，初一语文。翼城方言，撞，念 chuāng，音同闯。我到北师大才弄清二者异同。初中语文第一课：“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我没考证三山五岳是哪三山哪五岳。没有敬畏，以神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焉能不败！

1959年，人民公社大锅饭时代，我村上街某队食堂发生李鸿祥“反革命投毒案”——大食堂剩饭变馊，有部分社员呕吐拉肚，怀疑是地主富农李鸿祥投毒——正好那天他赶车去南梁，没中毒，制售药物的杨福平供出李氏曾购买砒霜。今天这个无头案无从坐实。但我觉得他没有作案动机。况且那个时代冤狱遍寰中。枪毙人的阵势叫公审大会，书记代表全村，上去用鞋底抽打李鸿祥。据说罪犯李鸿祥头颅开花，即有老妇取热乎乎的脑浆取回家，当药补身体。

四清时父亲对《二十三条》甚为敏感。四清内容之一是清经济。父亲是大队会计，常在河边走。奇怪的是：他的检讨说他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好好改造世界观——天哪，他的世界观宇宙观不就是天圆地方，“庄里南常程公村，上下白马一溜顺”吗？我为此长期困惑：有这样清苦勤劳的资产阶级吗？他有什么资本可言？好在本村村民憨厚，没人对父亲下石。倒是常常听到村民赞美同情父亲。工作队长表扬说，一位大娘夸安受祜是个好人。这个冠冕，是很难得的。后来《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的路的当权派，父亲才如释重负。哥哥因为这个家庭背景，虽然高中毕业，能读会写，却不能参加社教工作队，因而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高中生回乡务农，多少有些憋屈。嫂子是初中毕业，也是知识青年，按说学历也不低，应该当个会计或生产队干部，不会有困难。

四清的时候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也就是重新划阶级成分，人分三六九等。大家都希望自己在民国时越穷越好，最好是提刺棍要过饭被狗咬过。据说人家希望把我们家的中农成分改为富农。要是这样，我们就成了狗崽子。人的心理变态了。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二）

——老高三里没“顽主”

朱 特

1968 年 9 月 9 日，从北京出发到内蒙古土左旗插队的知青，经过一夜的旅途到达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在旗中学滞留了一天，11 日上午这群北京来的知青又分赴坐落在土默川平原上的各个村庄。

我被分配到一个叫雨施格气的村子。后来我一直就称它为雨村。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好像还有点诗意似的。一起登上送知青到雨村的大卡车，除了来自四中的 10 条汉子，还有女十中的 10 个姑娘。金秋 9 月正是土默川平原的收获季节，平坦又略有起伏的田野上，东一片西一片的庄稼地里不时显现出劳作人的身影。眼前的这块广袤的土地让我感觉它和我的家乡——华北大平原太相像了——一望无际。它和家乡不同的是，这里有着大片大片泛着红色的草滩，还有平原北端那绵延千里横亘东西的大青山。这又分明告诉我，这里是塞外高原。

大卡车在乡间的土公路上颠簸前行，汽车尾部升腾起的黄土暴烟犹如一条长龙与卡车如影随形（40 年后，也是金秋时节，我再次乘车走同一条路，当年的土路早已成平坦的柏油大道，青山依旧好，人却憔悴了）。在偌大的京城里面，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不啻寥廓天宇中的星星，有着各自的运行轨道，不会交叉不会碰面更不会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然而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这一群青年如同海滩上的沙子，被混浊的海浪推拥到了一起。于是这 20 个人的今生今世就有一段生命历程中不寻常的同路人经历，每个人就注定成为另外 19 个人记忆中的永存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守望。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却也跳脱不出一个“缘”字。

车上的 20 名男女知青，自然而然分成两个谈话的圈子。不记得说说笑笑指指点点的具体内容了，唯一记住的一个细节是，一位仁兄看到公路边赤膊干活的男人们穿着贴身花腰子，说了一句“要知道我把家里的花塑料布拿来了”，引起

一阵笑声。此外还有那高远的蓝天白云和晃眼的阳光，还有就是那渐行渐远的大青山。我不知道卡车将停靠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只是那突然而起的女生合唱，把我的记忆定格在去雨村的大卡车上。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这是电影《军垦战歌》里的主题曲。我看过那部纪录片，里面描绘的生活既浪漫又充满激情，那是让许多青年人向往的生活。在充满宏大叙事的时代里，这部电影很煽情，那里面的歌曲也都很好听，会让那些只知“革命”不知其他的年轻人热血沸腾头脑发昏，为着一个虚幻的理想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

女同胞的歌声让我为之一振，也想放开喉咙吼上两嗓子，但没有敢行动。一是不认识人家，二是我只会前面几句，惟洗耳恭听。女同胞们在素不相识的男生面前引吭高歌，也让我心生感佩。

这就是第一次踏上雨村之路中的一个片段。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在我的人生路上却是特殊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又和这样的歌曲联系在了一起。当我离它越来越远的时候，它反倒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当我独自悄悄哼唱它的时候，透过泪水仿佛看到土默川平原上飞驰的大卡车上的那 20 名青年男女，还有那流淌在蓝天白云间的歌声，还有，还有就是那青春的背影。

现在当我再哼唱它时，不是为了曾有的傻气，而是为了祭奠我的青春。

在大槐树下与阿生、二子相约奔赴广阔天地之后，想着的就是将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插队。临出发前，阿生从学校带来消息说，我们仨和七个老高三的编在一组。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阿生这里面有没有顽主？老实人阿生告我说他不认识这些人，但知道他们不是四中里的风云人物。四中就在我们大杂院附近，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我常去看大字报，眼见得那些高干子弟们呼风唤雨叱咤风云，本事大着呢。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在一首写老（红卫）兵的词中，好像有“孔丹志

不抒，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词中三人都是四中学生，贵胄子弟，当年了得，现在仍是了得。正应了那句话：这世界是他们的。

顽主是文革孵化的怪蛋。在崇尚暴力的年代，也造就了这样一批好勇斗狠用拳头打天下的主儿。我所在的三类学校顽主多，我和他们哄在一起打过架也挨过打。老高三若是顽主人高马大，我可不是个儿，说起来是七比三呢。

上了火车，在10人一组的包厢坐中，我终于看到了那同班的七个老高三。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帮人的言谈举止与我的那些中学同学及大杂院里的秃小子们相比绝对属于另类，一个个文质彬彬，透着一股子知识分子的劲儿，没有一点“要武”的狠样。我当即把这个感觉告诉了阿生。顽主挂相。他们无相，所以不是，我也放心了。

在西行的列车中除了阿生、二子外，我没有第三个相识的人，只有暗暗地注视和观察着这些对我来说有点新鲜并将日夜相处的一群人。

最先引我注意的是一个白净面皮戴眼镜的高三生。他的知识分子举止比其他人更强烈鲜明，他时不时地和别人开玩笑，张嘴说话总要先吐出一个“嘻”字，别人也同样以“嘻”作答。我总觉得这个“嘻”的出处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我还听到有人对他说，到了农村你这知识分子的味儿可要改一改的。这个人后来被雨村老乡送了一个二饼子的绰号。在列车上的那一夜高三生与我有过什么对话统统不记得，只记得整节车厢的同插们一起作过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祷告。

到了雨村吃罢欢迎宴，村里再次给我们知青编组（这次再编组是雨村贫下中农之间的博弈，下面会提到）。老高三的负责人，一个绰号为叶公的兄长对我们仨说，你们也要分开呢。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来大杂院里的一块闯江湖的三个人不能在一起了，我对阿生和二子说我跑单，你们在一起。阿生还要和我争，我说别争了，就我吧，你们在一起相互照应着别受欺负。这样，本想仨人在一起的愿望落空了。

于是我就和力兄、二饼子、三哥、包四四个老高三分在了一个知青户。来到雨村的小营子也是第一生产小队落户。后来我问二饼子为什么当初把我们仨分开，二饼子悠悠地说：这样分为的是在哪边老高三都占多数。嘿！不知不觉中就遭到“算计”。

后来，我和这帮老高三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后，向他们说起北京顽主的种种

事迹，他们就像是听故事，竟然不知京城里还有这样一群子弟。真是一帮书呆子。

“七个老右派”

“七个老右派”，指的就是雨村的七个老高三。这句话似乎来自另外一个村子的知青口中。我理解这句话中的“右派”含义，是没有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暮气沉沉没有革命小将敢打敢拼锋芒毕露的斗争勇气，是文革中的逍遥派。这样的评价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里是很不好的，最起码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如果再上纲上线问题就严重了。

不能不承认，我们这拨知青到了农村之后，在当地掀起了一轮阶级斗争的小高潮。那时毛的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表，从京城来的知青们似乎是天然的革命者，把京城里那套打人斗人的把戏搬到了农村，不时传来某村知青痛打地富分子的消息。直接看到的是，刚到黑河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把入土没几天的地主（或是富农）分子掘墓焚尸。那天，旗知青办把邻近村庄的知青都召集到了那里开了现场斗争大会，无非是让知青们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吧。那天我也去了现场，看到了那个从棺材里拉出来的躯体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焚烧的过程，但没有想到天下还有“伤天害理”四个字。

雨村也紧跟形势，我们刚去，村里就把全村的地富分子集中到大队部，挂上写有名字的白布条，专门让知青们认清记住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后来又召开了两次全村性的斗争会。

雨村当中不乏有想借知青之手大开杀戒的村民，怂恿知青动手打人。我就亲耳听到有人对知青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地富）呢？别村知青打得可厉害呢。“七个老右派”不为所动，斗争会积极参加，喊口号也举胳膊，但没有一个人动那些斗争对象一个手指头。那时只要有一个“右派”出头当“左派”，我准是第二个，我曾跃跃欲试呀。在那个混浊的年代，多少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被洗脑之后人性泯灭兽性大发，沦落成打手和杀人犯。我得感谢“七个老右派”，他们的老成持重，在荒诞年月年里保持着做人的本分，使今天的我少受些良心的谴责。斗争会好像是特意为知青开的，看到知青没有任何反应，开了两回以后就再也没有开过。接下来的肃清“内人党”时，叶公被指派看守雨村的“内人党”。我问他如何对

待“内人党”。“和他们（所谓的内人党）聊聊天、抽抽烟”，他笑嘻嘻地对我说。而那时所谓的“内人党”被殴致死的为数不少，其中不乏知青“手笔”。

力 兄

“小朱，你们家来电报啦。”

这声喊叫是力兄发出的。他也许忘了，但我一直记着呢。

那是刚到小营子不久，从女生宿舍吃完晚饭回九和处。路过小队部时，只见里面灯光明亮人声嘈杂红火热闹。我好奇心重，跑过去看究竟。原来是一屋子人在押宝赌钱。我看着新鲜好玩也刺激，于是也站在炕上的人圈外伸着脖子往里瞧。老高三的叫我去，看得正在兴头上的我没理他们。过了10多分钟，忽听外面力兄大喊：“小朱，你们家来电报啦！”那时有电报即有大事，心中一惊，立马跑回问电报何在，力行兄笑眯眯道：“你妈来电报说不让你看了。叫你回来睡觉。”二饼子补了一句：没人管着，你这小子是不是还要学坏？我没话可说，洗洗睡了。

在雨村3年，我同力兄情如兄弟，朝夕相处共同劳作，我们曾一同到山上当民工，也一起扒车到兵团。有一件事我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力兄曾跳入井里勇救落井儿童。这是英雄之举，说明力兄是真爷们。只是那时不像现在，如果搁现在，网民们一定会称力兄是最美爷们。

我是和力兄同一天结束雨村插队生活的。我们是在1971年12月26日那天离开雨村，同时离开的还有新国同学。那个寒冷的清晨，一辆小驴车拉着我们三个人的行李走在茫茫的田野上。那一对幸福的人儿时不时的说点悄悄话，让我不仅羡慕还有点妒忌。

那个早晨，我们都对新的生活怀着新的希望。

包四兄

二饼子说当年在学校时每天中午带饭，包四兄带的总是包子。包子，包子，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包四。

包四兄是我的炕友。三年间每晚都亲密无间地倒在炕上，鼻息相闻酣然入睡。

我睡觉有时不老实常常侵犯近邻，包四兄自是不愠不恼。包四兄长着络腮胡子，看上去很凶，其实是大好人。此兄是那种平时言语不多肚里有货的主儿，从来没有和我开过涮，不像三哥。

包四兄是属于那种牛皮纸灯笼型的人物，从外表看不出什么出奇之处，但那内里亮堂着呐。我自学高中物理时遇到不通处问三哥，三哥就叫我请教包四兄。每到这时，包四兄虽口讷言拙但逻辑清晰，三言五语就让我顿开茅塞。在理科上三哥甘拜下风，他说在学校时遇有难题也是请教包四兄。这话我信。

包四兄的动手能力堪称一流。小营子的广播缺麦克风，包四兄就用一只舌簧喇叭代替，惊倒小村人。每次看到管广播的老汉一本正经地站在挂在墙上的小喇叭下作宣讲，就从心眼儿里佩服包四兄的聪明才智。村里电路上有了故障，包四兄手到病除。村里人给包四兄定位：搞技术的人。还真说对了，后来包四兄就成了低压电器行业中的高级工程师。

二饼子和三哥

在雨村人送二饼子这个绰号之前，他一定还有另外的绰号。二饼子这个绰号虽然俗气却也不伤大雅，况且特征鲜明。故二饼子在雨村叫响后，从学校带来的称号反倒被人遗忘了。

三哥在家中排行老三，顺其自然叫老三，我近些年叫三哥顺了嘴就延续下来。把他们俩搁在一块儿，是因二饼子说他和三哥是幼儿园的发小、世交。而且还扬言，双方默契到对方一开口就知道要说什么，用文雅的词儿说就是心有灵犀，换成咱老粗的话说则是一撅屁股就知道拉什么屎。这话虽糙，说的都是一个理儿。两位仁兄是我人生旅途中甚为重要的旅伴。当我的生活轨迹与他们在雨村相交之后，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便改变、丰富、充实着我的生活。没有说教没有大道理，只是在平凡琐碎日复一日简单甚至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展现他们对生活的宣示，以日常生活的作息告诉我生活应该怎样。他们对我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把日子过好。“把日子过好”实在简单不过，但真要过好也须下工夫，这是见仁见智的事，不复赘言。

二饼子是知青中讲究吃的主儿，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苹果和梨一定要

削皮吃，说是，要的是意境（40多年前吃类似水果去皮，甚至会让人上纲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会儿老是喊“形势大好”，可是吃食总是不好。二饼子虽有一身烹饪手艺，在雨村能施展的时候也不多。

二饼子的洁癖在知青圈里尽人皆知，洗脸、刷牙、洁身自有一套程序，一点也不能马虎。我曾叹气，二饼子洗过脚的水比我洗完脸的还清亮。二饼子梳洗完毕之后还有一个毛病（或说是习惯），总要抹些护肤的东西。有一次我在他蒸的馒头里吃出了友谊牌护肤脂的味道，一问，果然是他洗过手之后抹了点那玩艺儿。我向他提出抗议，三哥在旁边，对我的灵敏味觉佩服不已。

我在村里三年的时间，二饼子一直在农活之余坚持不懈地做着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即通过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广播，搜集国家省部级领导人的名单（可能还要宽泛一些）。当时不像现在互联网四通八达，鼠标一点天下事尽知，村里似乎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广播也不甚发达，说是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处处保密，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所以二饼子的工作既艰辛还又“可疑”。我问他是不是给“国军”提供情报，他笑道不敢，不敢。爱好，爱好。这样的爱好好像还在坚持着。

应该说说三哥了。三哥在家行三，先是叫他老三，后来我改口称为三哥，其中有尊敬的意思。他是在雨村生活时间最长的知青，他在小村整整待了10年，是最后离开小村的知青。三哥的故事最多他的经历也最坎坷，这应该是他自己该说的事。我只说我与他交集的三年雨村生活。

我和三哥打过架。起因是什么早已忘记了，反正是我急了眼犯了浑。当我挥拳抡向三哥时，三哥却不躲不闪更不还手，看着我平静地说，你打吧，你打吧。我立刻僵住了，抡出去的胳膊也耷拉下来。我身经百架，但这阵势我从没见过。三哥胜之不武，轻巧拔了我的气门芯，心中的怒气一泻无余，三哥让我臊眉耷眼让我心服口服（当时在场的只有包四兄）。

彼时江湖险恶，游走其间害人之心虽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却不可无。倘若会点防身术，既可强身自保也能教训那些宵小之徒。出此目的，三哥曾拜师学拳击术。那拳师是外村的飞飞，此人虎背熊腰，自称拳术精湛，在京城时曾拳打街头小痞子扬威立万。

一段时间三哥有空就丁字步站立，收腹、耸肩，两腿微曲，右手在前左手在

后护住面门，然后就舞动胳膊打出直拳、摆拳、勾拳各式拳路，嘴里还“咔、咔”有声，如同几十年后武打影视剧的配音效果。三哥做事认真总想做好，练习拳术也如此，不过我实在不敢恭维三哥的拳术。他越是认真做动作，越是让人发笑，后来自知不是江湖上行走的料，那拳术也就看淡了，改学屠龙术了。

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三哥编排我抢吃抢喝的段子。每次雨村人聚会，他都把这无中生有的事宣扬，让我百口莫辩。即使是被抢的当事人当众澄清，三哥仍乐此不疲坚持不改，竟连知青二代也知道了，实实气煞人。其实，三哥糗事也是一箩筐，只说一事，以示报复。

话说那年初秋时节，我们哥儿五个出大队工，在雨村西边的漫滩地修一条挡水坝。这条东西向的土坝高约3尺，坝的北面是不长庄稼的漫滩地，土坝下面是宽不过5尺深约尺余的水沟。漫滩上有许多被夏季雨水冲来的庄稼秸秆，已经被晒干，是上好的柴火。

收工之后时间尚早，有人提议到对面漫滩地上拾些柴火再回家（多会过日子）。如何过水沟成了难题：这沟若是在平地，一个助跑就跳过去了，但这土坝上却无法助跑。我面对土坝下的水沟突然想到了撑杆跳。我把抬筐用的杠子一头插进水里，然后利用土坝的高度身体向前一纵便跃过水沟。过去之后我又把杠子推回来，力兄、包四兄、二饼子都如法炮制轻松过沟。最后是三哥，我们都站在漫滩上看着他如何过沟。

只见三哥手持抬杠，虎目圆睁气沉丹田捋臂挽袖，又吐唾沫又搓手，准备动作比谁做得都多。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三哥高高跃起然后是直直落下，那杠子插在水中什么地方三哥就落在了什么地方。没等三哥走出水沟，我们早已笑瘫。抱着柴火往回走的时候已是日薄西山，三哥央告哥几个走慢点，问为什么，他指指湿了半截的裤腿说别让女生看见。

烟友叶公

插队的第一收获就是学会了抽烟。“男子汉不抽烟不喝酒，白在世上走。”教唆我抽烟和我教唆别人抽烟的时候，这句话时常挂在嘴边。在学校的时候，玩伴当中就有抽烟的，由于守着家长我不敢学，怕的是遭受皮肉之苦。来到雨村真正

是天高皇帝远，我的事我做主，这抽烟一定要学的。

抽烟好呀，起码是表示我已经成为成年人了，是男子汉了。一支烟叼在嘴边总是有些派头的，那些小女生们一定会多看我几眼，多么酷！这是我学抽烟的最初想法，等到我得了尼古丁依赖症，发展到不抽烟就难受的时候，那些吸引异性眼光的想法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刚学时抽的都是好烟，经常是“长眉毛”（大前门）、“炉算子”（恒大），有时还来包“红牡丹”。等到成了瘾，就改抽烟丝和旱烟叶子——抽好烟抽不起啦。

叶公是和我同时学抽烟的。我和他经常在一起交流抽烟的心得体会和技巧。比如，是左手夹烟还是右手夹烟，是拇指和食指还是食指与中指持烟更有派头，烟圈怎么吐才能又圆又大还持久，在江湖上如何敬烟和受烟，弹烟灰的动作该怎么才显得更潇洒……抽烟的学问大着呢。饭后一支烟活似小神仙，谁个比得了。叶公是男知青里最先离开雨村的，他去了旗里的轴承厂。他每次回村我都要跑到他那里狂抽他带来的好烟，喷云吐雾大过烟瘾，抽得让他有点心疼。如今我早已把那口嗜好戒了，因为早过了吸引小女生眼光的岁数了。不知大洋彼岸的叶公是否还饭后一支烟呢？

40多年前在雨村我结识了这帮老高三，朝夕相处的三年，这些兄长平等待我且对我出格言行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处处表现出兄长风范。每每诅咒那个狂乱的年月时，又庆幸让我结识了这样一群朋友，这是上天的赐予，可遇不可求。孔夫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我的老高三的朋友皆然。

三年，在雨村时度日如年。现在很想再有这样的三年，哪怕是三天。

【资 料】

对师大女附中运动估计和下一步运动的意见

1966 年 6 月 13 日

张世栋

对我们这里运动估计和下一步运动的意见：

我们工作队 6 月 3 日进入学校，工作组到现在已经进学校九天了，这几天运动怎么样？好得很！因为我们学校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新的阶段：

1. 广大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并积极行动起来了，对修正主义黑线和代表人物进行大量揭发，大、小字报已经贴了 1000 多张了。广大师生员工动起来，勇敢批判。

2. 建立了师生代表会，把革命师生组织起来了，我们已经发动起了群众。

3. 从 6 号开始上课，文化革命，上课和学毛选等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

4. 出现了一大批有材料，有分析，有分量的击中要害的大字报。斗争水平，战斗力不断提高。

5. 广大师生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有了飞跃的提高，几天的进步胜过几年，立场坚定了，斗争性增强了。

6. 取得了一些经验，为下一步斗争打下良好基础。

我们存在的问题都是方法性，也是难免的，不足为怪的，当然我们要注意。应该肯定，坚决肯定，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运动是健康的，正常的。因此要做一个革命派，就必须满腔热情地，热烈地完全支持参加这个运动。我们还应该戒骄戒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有的人觉得运动快结束了，这种人看到了成绩，但看得过高。我们的运动刚刚开始，还应乘胜前进。

今后几天的任务：

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大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弄清问题性质，为今后斗争打好基础。

1. 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这场斗争是要“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斗争，这样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要好好学习毛著，活学活用，可根据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问题好好学毛著。6月1号以来的社论也要好好学习，只有学好了，才能更自觉地参加，才能取得运动的彻底胜利。

应该把学习和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学了之后，用于斗争。

1) 坚持学习时间，认真阅读文件，好好领会毛著和文件的精神。

2) 提高大字报的质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要打中要害，就必须提高质量。(1) 这样就必须好好学习主席思想。(2) 题目要抓准，感到有什么问题，写什么问题，要抓要害，反映它的性质：i)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ii) 专家路线，iii)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iv) 对待工农子弟、革命教师、干部子弟。可以自由结合，集思广益。

3) 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一道革命。大多数人是好的，对方向简单的少部分人是有问题的好同志（内部矛盾）。对他们给压力，应耐心点，帮助。这种人应赶快觉悟，否则就不对了，应和革命师生一道革命，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孤立敌人。

4) 要坚决执行中央八条规定，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新的革命秩序，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斗争，提高战斗水平。

选自《罗治笔记》

【资料】

在师大女附中的讲话

1966年6月17日

张世栋

一、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有很多人的意见还没讲出来，他们要求把心里话讲出来，他们要求是对的，他们的意见是好的。因此现在仍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只有搞好这点，才能领导同学更好地有重点的揭发批评。

二、怎样进行普遍广泛的揭发批判呢？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愿意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只要你感到他有问题，就可以揭。大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任何人都可以揭发批评，可以提不同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是非。我们提倡大家辩论。揭发批判的形式可以随便点，可以自己搞，也可以几个人搞。

三、从工作组入校以来，还是注意发动群众，但与党的方针还不够。思想上还有怕“乱”的思想，还不够放手，因此有急躁情绪。今后我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动、带领、支持、依靠大家革命，也和大家一起闹革命。

四、希望一切革命的师生积极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的热潮。要打消一切顾虑，放下一切包袱。一个同志在运动中怎样，不是抽象的，要看他的行动。看他是不是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

选自《罗治笔记》

【编读往来】

1. 童良谈老田的学风与文风

《记忆》编辑部：

老田上了贵刊，在我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因为第一，老田的学风与左共舞。他的文革研究，说穿了，就是要用史料来证明他的胸有成竹。他采访当年的造反派，从他们的嘴里，选出符合己意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要与李逊商榷，首先得学学李逊是如何处理史料，如何站在中性的立场上评价人物。第二，老田的文风与时俱进。他的文章不是为了让人看懂，而是为了让人知道他有多大多深的学问。李逊是尽可能把高深复杂的问题平易化，而他则是尽可能把平常简易的问题高深化。他想跟李逊商榷，首先得学学李逊的文风。

话说回来，人不是一成不变，事也不可一概而论。老田这篇文章还没有明显的派性，他引经据典也花了不少功夫。文章写得虽然绕，看到第三遍的时候，总算还能看懂。而且，还总算讲出了一些道理。

或许，这就是贵刊发表其文的理由。或许，贵刊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界，《记忆》海纳百川，只要讲道理有根据，就来者不拒。而对老田这样的少壮派，还要给予置顶的鼓励。我知道贵刊有“面向青年，面向业余，面向民间”的定位，但愿老田这样的撰稿人能够体会《记忆》的苦心，由此改变学风、文风。

童良 于渝中

2014-7-10

2. 《记忆》答童良来信

童良先生钧鉴：

《记忆》刊发老田之文，有两个原因。

第一，李逊的鼎力推荐。李逊认为，老田在社会学方面有相当的理论修养，他的《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层以及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一文，提出了一些值

得注意的观点。对研究文革中的造反派的形成有启发。

第二，李逊关于“革命名分”与造反派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学者自成体系的原创性成果，具有独特性和系统性。刊发老田与李逊的商榷之文，有益于引起学界的重视。

谨此奉答，并颂撰安！

启之，于北京

2014-7-12

3. 后皇嘉树勘《记忆》第二期程明远生平之误

《记忆》编辑部：

拜读《记忆》第二期，其中有关于程明远的资料。今天上午访问程明远侄子后，请恕我勘误：

一、贵刊说，程明远生于1900年。程侄说，程明远出生于1902年农历四月十一日，即1902年5月18日。

二、贵刊说，程明远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程侄说，他入党的时间是1927年。

三、贵刊说，程明远1969年夏，被作为“叛徒”、“黑手”关押、批斗中去世。程侄说，1972年，程明远以“叛徒”等罪名被判刑十二年，并于当年去世。

恭祝夏安。

后皇嘉树

2014年7月19日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